

# 理论与实际

LILUN YU SHIJIAN



5

1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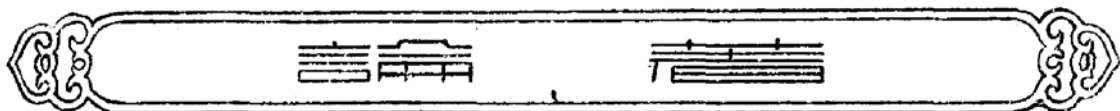
# 目录

- 积极开展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 ..... 梁 嘉 ( 1 )
- 增产節約是建設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 严克柔 ( 5 )
- 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問題 ..... 杨 懋 ( 9 )
- 坚持“理論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則 ..... 梁 克 ( 15 )
- 談談工作方法問題 ..... 龙世雄 ( 18 )
- 两条腿走路与唯物辯証法 ..... 王道一 ( 23 )
- 全面認識和正确利用計件工資制 ..... 陈文川 ( 26 )
- 对取消計件工資問題的一些看法 ..... 李 中 ( 31 )
- 再談国营企业間生产資料的交換关系 ..... 孙 孺 ( 35 )
- 試論中国封建时代历史的分期 ..... 关履权 ( 39 )
- “五四”运动在广东 ( 研究資料 ) ..... 胡希明 ( 45 )
- 前后之間 ..... 何家言 ( 50 )
- 漫談讀書 ..... 刘启扬 ( 51 )
- 对“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的意见 ( 讀者中来 ) ..... 鞠健生 ( 53 )

附：孙冰同志的复信

## 动态

-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 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討論曹操問題
- 广东經濟学会和广州哲学会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
- 广州市高中历史教师座談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問題
- 华南师院討論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問題



## 积极开展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

梁 嘉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一門很重要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今天正在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要把我國建成為具有高度發展的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是不可能的。黨中央和毛主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廣大的幹部和羣眾的理論水平却還是不高的。由於我們的理論水平不高，我們就不能很好地從理論上體會黨的方針政策，也不能正確解釋和概括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豐富經驗。如果我們不認真地、大力地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工作，就要影響我國建設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周恩來總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社會科學方面的理論研究工作也應當積極發展，加強領導。忽視它的重要性是不允許的。應當鼓勵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進行系統、長時間的努力，充分掌握有關的資料，從事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周總理的指示很重要，我們應當把它作為今後開展社會科學理論研究工作的總指針。

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中，加強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在今天具有特別重大和迫切的意義。這是由於經濟科學理論是直接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理論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指

南。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六億多人口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不斷地向我們提出許多新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很好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認真學習蘇聯和兄弟國家的經驗，按照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才能夠擔負起經濟科學所面臨的這個重大任務。可是直到現在，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還很薄弱，遠遠不能適應經濟建設事業的需要。建國以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還存在某些缺點。這些缺點的產生，主要的還是由於我們的實際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既缺少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經濟建設的理論知識也不足。假如說目前我們的經濟工作還不夠落實的話，那末除了某些幹部的思想作風上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正是由於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不高，對客觀經濟規律認識不足，忽視它們的作用，以至在實際工作中否定客觀存在的價值規律，否定按勞分配，否定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否定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的規律等等，從而也就不能完全正確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以致出了一些毛病而不自覺。這就說明，加強經濟理論的研究工作是很必要的。

黨教導我們，今後經濟工作要落實，要越做越細緻。怎樣才能做到落實、做到越做越細緻呢？最根本的就是要承認和正確掌握客觀經濟規律，這就要很好地研究經濟理論。只有這樣，才能使廣大幹部從理論上正

确理解党的經濟工作方針和政策，自觉地、正确地貫徹执行，并通过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計劃来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人民內部矛盾主要地和大量地表现在各种經濟关系上，这些經濟关系都反映一定的經濟規律的作用。因此，我們在制定計劃、执行政策过程中，就要考虑和体现客观經濟規律的要求。例如，工資政策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則，价格政策和我們的經濟計劃，要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和价值規律等等。价值規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正确認識价值規律和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学会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利用它們，就能够帮助我們正确地貫徹执行党的經濟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学会經濟管理，更好的搞好社会主义經濟建設工作。而这一切，只有深入地、認真地学习和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濟理論，才能达到。

要發展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必須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使理論研究为社会主义經濟建設服务。理論密切联系实际是一个原則問題。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方針，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空談理論的教条主义傾向，因为这种傾向使我們的研究工作离开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同时也要反对忽視理論、認為实际就是理論的傾向，因为这种傾向使我們不能正确掌握和利用客观經濟規律，更好地总结实践經驗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这两者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設工作都是不利的。我們的理論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必須既参加实际斗争，又研究党的政策理論。理論知識較多的同志，要更多地注意接触实际；实际經驗較多的同志，要更多地注意提高理論。两者各向自己不足的方面認真地积极地学习。

目前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还不是占有大量的实际材料，而系統的理論研究也还做得

不够。因此，我們既要加强实际調查，积累資料，又要对基本理論进行認真的研究，只要一方面，不要另一方面是不对的。只有把两方面很好的結合起来，才能在占有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来对实际工作中提出来的問題进行創造性的研究和概括，正确認識和掌握客观規律，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在当前理論研究工作中，既要当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对实际工作能馬上見效的理論問題进行研究，也要进行有系統的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資料，既要普及，又要提高。特别是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是搞提高工作，既要有重点，又要照顧全面的发展。所謂有重点即是說要着重研究当前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例如人民公社問題，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問題，按劳分配問題，提高劳动生产率問題等等。从理論上闡明這些問題，对当前經濟建設有着迫切的意义。因此必須着重研究。但除此以外，对中国和外国，古和今的經濟問題也要进行研究。对于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也必須加以研究和彻底的加以批判。对待中与外、古与今的相互关系必須有正确的态度，我們反对厚古薄今，反对学术研究脱离政治、脱离当前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但我們并不反对研究古代，并不反对研究历史；相反地只有認真地研究历史，才能更好的了解现状，只有很好地研究和继承历史遺產，才能更好地發展我們社会主义的經濟和科学文化。我們反对盲目崇外，也反对妄自尊大，拒絕一切外来的东西。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更要采取虛心学习、認真研究的态度，以利用这些經驗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要开展經濟理論研究工作，就要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很好地組織起来，分工协作，相互配合。要把科学研究机构的力量，高等学校的研究人材与实际工作部門的研究力量很好的結合起来，如果分散进行，将会事倍

功半，浪費很大。科學研究機關應該系統地進行研究工作，既要研究當前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也要作基本理論、經濟史、部門經濟的研究，積累資料，培養幹部。同時又要與高等學校協作，並幫助實際工作部門開展研究工作，使科學研究機關成為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中心。目前廣東省社會科學的研究機關還只有中國科學院廣州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力量還很薄弱，要逐步充實起來。各高等學校、黨校和幹部學校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組）和經濟系是進行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要基地，也應該組織起來，結合教學和實際調查，開展經濟研究工作。黨政機關特別是財經部門的實際工作者，他們接觸實際較多，工作經驗較豐富，搜集和掌握材料較容易，但是他們的時間不多，應當鼓勵和組織他們結合本身業務需要，對當前急需解決的經濟理論問題進行研究。幾方面的力量如何結合，進行分工協作，我們還沒有經驗，但可以吸收其他地區的經驗。例如，由研究機關聘請高等學校教師和實際工作部門的幹部做研究員，擔任一定的調查研究任務；研究機關同實際工作部門掛鉤，相互提供經濟材料和情報，建立經常的聯繫制度；組織經濟學會的活動，定期舉行學術討論，交流經驗和交換意見；通過學術刊物組織大家寫文章，討論重大理論問題等等。這些經驗都是可以參考的。我們還可以創造和採取其他形式，把各方面的研究力量更好地調動和組織起來。

發展理論研究工作，必須樹立優良的學風。首先必須提倡在學術問題上自由討論、暢所欲言的風氣，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在學術研究中，心平氣和、暢所欲言的精神還不很夠。要發展學術研究就必須培養和樹立既“和”且“暢”的學術討論風氣，也就是說，在學術討論中，既要提倡心平氣和的討論，虛心商榷；又要打破一切顧慮，暢所欲言。只有

心平氣和，沒有暢所欲言，各種意見不能充分發表，討論就很難深入開展。只有暢所欲言，沒有心平氣和，不虛心聽取別人意見，討論也難獲致良好結果。要提倡既“和”及“暢”的風氣，就要分清政治思想問題與學術問題，分清資產階級思想觀點與一般學術觀點。在學術問題上必須容許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發表和自由爭論，不要隨便扣帽子。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問題，有的還沒有定論，在經濟建設實踐中也還會不斷碰到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因此，更應該容許不同意見並存和爭論。甚至一個人前後有着不同的見解也是應該允許的。既然社會主義經濟科學是一門新的科學，它面對着許多新的問題，那就只有通過自由爭論，才能把這門科學理論發展和豐富起來。

要樹立良好的學風，還必須養成謙虛謹慎、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應該虛心聽取和研究別人的論點以及相反的意见，而在研究別人意見時，不要斷章取義，要全面研究別人整篇文章的內容，是基本對還是基本不對；那些對，那些不對；對的中間那些值得學習；不對之中那些值得研究。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錯誤觀點，但是也要敢于堅持真理，展開爭論。要充分的占有材料，掌握科學根據，進行認真研究，然後才去樹立論點，這樣立起來的論點才能說服人。在理論研究中，敢想、敢說、敢干是好的，但是必須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有的人把敢想、敢說了解為可以毫無根據的發議論，認為對馬列主義原理也可以隨心所欲地要怎樣理解就怎樣理解，這就不是科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了。對兄弟國家的經驗更應當虛心研究，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雖有他們的具體情況和特點，但是我們還是應當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認真的加以學習和研究。對於政治性的問題，對於黨的方針政策的研究，更要採取嚴肅認真的態度。

做好調查研究工作對於經濟理論研究工

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客观经济规律，正确说明各种经济现象。这样，研究工作也就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非常不够，别的省、市，做得比我们好，值得我们学习。搞调查研究要有目的，要能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一定要客观，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自以为

是，也不要人云也云，更不应“各取所需”、“各取所好”。同样一个材料，如果“各取所需”，就会引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所以，调查研究的目的性，一定要同调查研究的客观性正确统一起来。不能盲目的搞调查，又不能主观主义的搞调查。总之，只要我们深入实际，充分掌握材料，认真进行系统的长时间的努力，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就会收到它的成效，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最近半年来，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已经先后成立了广州哲学学会、广东经济学会和广东历史学会。各学会都已广泛地开展学术活动，组织了多次的座谈会、报告会和讨论会。各专区也先后建立了一些学术性群众团体，组织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活动。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全省学术研究日趋繁荣。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推动本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普及工作，有必要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各学会决定成立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并以杜国庠、陈越平、戈枫、蔡承祖、孙孺、李超、张华明、王琴、徐升、王晷农、杨荣国、邓涛、杨樾、张江明等十四人组成筹备委员会，杜国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陈越平、戈枫为副主任。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简称社联）筹备委员会已于五月十七日正式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会上决定加紧进行筹备工作，争取于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广东省社联。在社联筹备期间，将加强广州哲学学会、广东经济学会、广东历史学会的工作，并继续成立教育学会、法学会、图书馆学会、语言学会和东南亚学会等。

筹备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广东省社联”章程及1959年下半年工作规划问题，并推定了起草人。

# 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严克柔

一九五九年波澜壮阔的工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的新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发展。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了用新的辉煌成就迎接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号召再一次地掀起一个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或者商业战线上，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都应当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又说：“我们应当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从思想上政治上动员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积极性，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

增产节约是一句老口号，是我国人民最熟悉的一句响亮的口号。因为增产节约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想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地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主要靠什么方法呢？这就是列宁所曾一再指出的：唯一的道路是要依靠自己的节约，依靠社会主义的积累。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增产和节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增产，就是消耗同样数量的劳动，却能增加更多的产品；所谓节约，就是在单位产品中的劳动总量的减少。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真正的节约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省，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整个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写道：“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伟大的创举）是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一般的经济规律，可是这个经济规律在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中按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它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不稳定的，并且由于经济危机常常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有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排除了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障碍，造成了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客观必然性和可能性。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和方法的增产节约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充分发挥其作用。增产节约运动不仅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增产产品数量，降低成本，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不断地扩大社会的再生产，使社会物质不断丰富，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满足，而且关系到我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水平，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过渡到更加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的问题。由此看来，增产节约运动就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大家記得，在過去幾年間，我們曾經進行了三次全國性的增產節約運動。一九五一年秋後，一九五三年秋後和一九五六年秋後的三次增產節約運動，都收到了巨大的成果。那末，現在提出的增產節約運動，有什麼新的特點和新的意義呢？

新的全民性的增產節約運動，是在新的形勢、新的條件下提出來的。是在去年生產建設大躍進取得空前巨大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去年生產建設的成果是史無前例的，糧食、棉花、鋼鐵、煤炭、機械等主要產品都比前年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增產的絕對數相當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增產數的總和。基本建設投資接近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投資總額的一半，我們建立了無數新的工廠礦山，增加了大量職工。經過去年大躍進的實踐，我們不但找到了一條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而且在這條康莊大道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因而使得我們有可能在今年繼續躍進。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所通過的今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無疑是一個繼續躍進的計劃，只要實現了這個計劃，我國的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將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將得到進一步的提高。要實現這個宏偉的計劃，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什麼辦法呢？總的來說有兩個辦法：一是新建、擴建若干企業，增加設備，增加工人，以增加生產能力；二是厲行增產節約，加速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了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需要大批地興建工礦企業，需要大批地增加機器設備，從而也要相應增加大批的職工。這是必須的，我們也正是這樣做，今年的基本建設計劃就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厲行增產節約，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却是最重要的。任何一個企業，不論是新的，還是原有的，如果不抓緊增產節約，提高勞動生產率，就不可能在增加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擴大社會主義積累，也就不可能擴大再生產。如果說，去年我們在新建、擴建工礦企業，增加機器設備，增加職工人方面數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對這些設備利用還不夠充分，工人勞動生產率還不夠高的話，那麼今年就要特別注意增產節約和提高勞動生產率了。特別是那些今年還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進行基本建設的地方（如廣東省），發展生產力的主要方法，就依靠挖掘企業潛力，厲行增產節約了。

有人說，經過去年的大躍進，生產到頂了，潛力挖盡了。事實顯然不是這麼一回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門路是很廣闊的，潛力是不少的。去年的大躍進非但不会堵塞增產節約的門路，而且為增產節約準備了有利條件。以廣東省為例，在去年大躍進期間涌進了大量的新職工，這些職工生產技術還不熟練，只要把這一部分人的技術水平提高一步，勞動生產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去年，我們增加了不少設備，這些設備的利用率還很低，只要把它提高一步，勞動生產率也會大大提高。還從機械化的程度來看，目前普遍存在着手工操作，笨重體力勞動仍占很大比重，只要我們抓住生產工具的改革，實現機械化、半機械化，勞動生產率也會成倍地增長。還有在勞動組織和生產組織方面，目前仍存在着許多不合理的地方，非生產的人員過多，勞動組織不完善，工人在生產中不協調，浪費了許多勞動力。只要我們進一步整頓勞動組織和生產組織，合理使用人力，就可以節省出許多勞動力，可以用同樣多的人生產出更多的東西來。由此看來，厲行增產節約，提高勞動生產率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增產節約必須當作一個群眾運動來搞，因為它既然關係到每一個人，是全體勞動人民的事情，那就非要把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可。去年的經驗證明，大搞群眾運動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群眾路綫是黨的根本路綫。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做什麼工作，只要堅持執



行这条根本路綫，工作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到失敗。去年，我們发扬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从而取得工农业生产輝煌的成就。今年，随着經濟工作愈加繁复、全面和細致，我們的群众运动也要愈搞愈深入，愈搞愈細致。可是，在新形势下，有不少人抓不到群众运动的主流，抓不到运动的关键，以致为运动而运动，这就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調动起来。群众运动要有一个鮮明的目标，要有一个明确的中心。周恩来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及时地指出，增产节约运动是当前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只要我們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向群众指出明确的奋斗目标，就可以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調动起来，就可以把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它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部門之間都有它具体的要求和門路，有它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在目前，不論那一个部門，那一个企业，那一个人民公社，都必須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作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内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工作，就是改进工具設備，消灭手工劳动，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并創造大量的簡易专用设备，克服設備能力不足的困难；就是改进操作方法，掌握新技术，提高技术熟练程度，发展技术上的多面手；就是革新旧的工艺，以縮短加工过程，創造新的工艺方法；就是革新产品的結構設計，創制新的产品；就是加强原材料的节约代用、綜合利用；就是改善劳动組織，改革經營管理方法，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在这些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項目中，可以因时因地制宜，规定它的主要的不同的工作内容，但是任何部門，在任何时候，最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具設備方面的革命，馬克思主义教导我們：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程度的測量器，而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物。工具設備是劳动中极为重要的因素，只有工具設備改进了，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改进工具設備，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应成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中心内容。所有一切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活动，都要达到一个共同目的，这就是以最少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劳动時間，創造出数量多、质量好、成本低的产品来。由此可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中心环节，是增产节约运动的中心内容。它可以做到增产和节约的統一，做到数量和质量的統一，做到多快好省的統一。生产技术的发展是无穷尽的，人們对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認識，是会逐渐全面和深刻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人們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生产中的决定作用，也会越来越突出。

增产节约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在目前，劳动竞赛是它的主要形式。如机械工业的“千台时”竞赛；冶金工业的“高产、高质、多品种”竞赛；煤炭工业的“全面、全年、大面积丰收”竞赛；整个工业战綫的“高产、高质、高工效”竞赛；运输战綫的“合理的多拉多載、快卸快装、安全正点”竞赛；基本建設的“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保証安全、节约建筑材料、降低工程成本”的竞赛；以及农业战綫的大面积丰产竞赛；商业战綫的以促进生产、执行政策、完成計劃、改善經營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向紅专进军为内容的“六好”紅旗竞赛等等。都是各个战綫因不同特点、不同任务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不同形式。开展竞赛将会調动群众的最大积极性，将使增产节约运动持久地、深入地发展下去。

社会主义竞赛，实际上是一个群众性的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的生产竞赛。它最能动员群众，增产节约，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們只要細心考察，任何时候，任何生产部門，总有比較先进的单位和先进的生产者，他們掌握着比較先进的生产技术，达到了比較先进的生产定額。如果多数人以致整个社会，都能达到他們已經达到的生产水平，社会的

生产力就会提高一大步。因此，在竞赛中，就要使这些在一定时期内、在生产上比较先进的集体和个人，成为竞赛中的榜样、旗帜，发动群众自觉地来学习他们，赶上并超过他们，使得本来只有少数的先进生产者所达到的生产水平，经过群众性的学先进、赶先进竞赛，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新的更高的生产水平。到了这个时候，必然又会出现少数高于这个一般水平的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成为竞赛中新的旗帜。如此你追我赶，落后的赶先进，先进的更先进，劳动生产率就会不断提高，而增产节约运动就会不断深入发展。

为了全面地深入地展开一个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增产节约运动，还须十分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中心问题是贯彻群众路线。一切与群众有关的事，必须无例外地和群众商量，让群众讨论，使领导的意图与群众的意见直接地互相沟通，使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更加活跃，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还要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百倍地提高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信心，从而使增产节约运动步步前进，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 中山大学历史系热烈讨论曹操问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四月份举行了两次关于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学术讨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系主任杨荣国教授和戴裔焯等其他教授、讲师、助教以及一部分同学。会上，大家都认为应该替曹操翻案，但是对怎样翻，翻到什么程度，大家的意见有不少分歧。如戴裔焯教授认为曹操是人民英雄，认为曹操打击了豪门，打垮黄巾军的领袖，没有消灭黄巾军，却将他们收编过来，没有违反他们的目的；曹操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制度，平定乌桓等，都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的。陈锡祺教授、陈玉森讲师等不同意见戴裔焯教授的看法，他们认为虽然应该替曹操翻案，但不要翻得过火，不要将曹操的一切都说是好的。陈锡祺教授认为曹操镇压黄巾军并把他们收编过来，并不是什么功绩；黄巾军的立场与曹操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曹操是地主阶级，决不会给人民土地以满足农民起义军的目的；又认为曹操的屯田制度，剥削比其他统治者还要厉害，其目的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虽然曹操这样做在客观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它与黄巾起义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陈玉森讲师认为曹操虽推动了历史前进，但却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不能说他是人民英雄。座谈会上对应怎样评价曹操以及曹操为何被骂为反面人物这些问题，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杨荣国教授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东汉到三国，当时豪门世族和广大人民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曹操当政以后却有意地打击了当时的豪强，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曹操的活动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历史主流是一致的，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如果替曹操翻案，应该抓住这个问题。胡守为同志说，曹操在历史上最大贡献是他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并认为应该从这方面评价曹操。

# 关于按劳分配与政治挂帅問題

杨 樾

去年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现，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发扬，所有这些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空前的巨大变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在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中，表现了一种急躁的情绪，提出了一些片面的、脱离实际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比如，有人毫无根据地对按劳分配原则提出种种的非议，有人把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有人干脆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否认物质利益原则，主张在目前条件下，就实行以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及时地、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长，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决议关于分配原则问题的这种十分明确的分析和规定，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们思想觉悟水平，在极大程度上纠正了我们对于按劳分配原则认识上的片面性，帮助我们克服了那种过早过急地企图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否认物质利益原则的有害观点和理论。

现在，关于按劳分配原则问题的议论，似乎已经转移到“按劳分配原则与政治挂帅”或“政治挂帅与物质利益原则”问题方面来了。这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种议论中，有人仍然在肯定的前提下，吹毛求疵地希图找寻按劳分配原则的所谓“消极因素”，提出所谓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面性”问题；按这些人的看法，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所以必须政治挂帅，正是因为按劳分配原则有其消极面，政治挂帅为的是克服按劳分配的所谓消极面，为的是逐渐“冲毁”——或者说得客气些，逐渐削弱按劳分配的作用。这些人虽然不再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不再否认物质利益原则，但对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物质利益原则仍然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

## 按劳分配原则有没有“两面性”？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榨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劳动者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总是大大低于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社会总产品中的相当部分，以利润的形式落进不参加劳动的剥削阶级的腰包，这是资本家不劳而获，劳动者多劳少得的分配原则。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创造出极大丰富的产品，随着确立了单一的共产主义的所有制，随着社会成员共产主义的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极大提高而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即每个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并按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求得到消费品。这是人类最理想的、最合理的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于生产力虽然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按照社会成员的需要来满足他们需求的水平；虽然摆脱了剥削的、社会主义的劳动已经成为光荣豪迈事业，但是劳动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虽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已经逐渐缩小，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还存在重大的差别；虽然人们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但是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还没有最后清除。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产品的分配，就不得不采取“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按照每个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所贡献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这种分配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劳而获，多劳少得”的原则有着根本性质上的区别，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则只是在合理性上存在程度上的不同。

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与资本主义的“不劳而获，多劳少得”分配原则之间的根本性质上的区别，似乎比较容易理解，而与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之间在合理性上存在的程度上的不同，似乎就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同？人们能不能以主观的意志去改变或削弱或冲毁这种不同呢？

我们知道，不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劳而获，多劳少获”，不管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还是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它们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分配问题上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加速以新的社会条件来代替旧的社会条件，比如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以按劳分配原则代替不劳而获分配原则；积极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从而以按需分配原则代替按劳分配原则。但是，谁都不能在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去改变、削弱、冲毁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分配原则，因为这是违反客观规律，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则既然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就这一原则本身来说，当然不存在所谓消极因素或所谓“两面性”的问题。

也许有人要提出反驳：那种对个人物质利益斤斤计较，在劳动中采取“按酬付劳”的态度，不正是按劳分配原则的消极因素的具体表现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在“各尽所能”的前提之下来对待“按劳分配”，而是把按劳分配原则歪曲为“按酬付劳”，说什么“一分钱一分货”，甚至不考虑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需要，而只考虑个人的物质利益。但这是人的意识问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黑痣”，不是按劳分配原则带来的。对于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即使在最合理的按需分配的原则下，他仍然是要“上下其手”——或者不尽所能而又需求很多，或者“以逸待劳”，不劳而获。难道我们能够说这是按需分配原则的消极因素吗？当然不能。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们的意识问题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按劳分配原则混在一起，硬说这就是按劳分配原则的消极因素，这叫做黑狗偷吃要白狗认罪。所以，当我们指出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比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更为合理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按劳分配原则带来所谓消极因素，而是就其相对意义来说，我们应该看到更合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并从而积极为过

渡到共产主义創造条件。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則却是唯一合理的分配原則。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是决定分配的基础；分配是提高生产的方法、工具和手段。按劳分配原則既如上述，是由社会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又是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工具和手段。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劳分配原則、物质利益原則，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結合。每个劳动者都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劳动，社会則按照他們所付出的劳动的质量和数量給予应得的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样就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并为生产得更多更好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有利于加强劳动紀律，有利于对那些“好逸恶劳”的人的劳动的监督，有利于鼓励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开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斷提高和社会生产的不斷增长，归根到底，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和有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經濟規律的按劳分配原則、物质利益原則，只有当人們有意或无意地违背它的时候，它才产生消极的作用，象決議所指出的，“就会妨害人們劳动的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长，也就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可见消极作用并不是它本身存在的，而是人們以錯誤的态度对待客观經濟規律的結果。

其实，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每一个社会都毫无例外地以人們的劳动生产为基础；但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独特的吸引人們参加劳动生产的方式。奴隶和农奴是在奴隶主和农奴主的鞭子下进行劳动生产的；資本家用飢餓的威胁强迫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剝削社会所固有的这些吸引人們参加劳动生产的方法、工具和手段，使劳动者都成为社会的主人。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还是謀生的手段而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用什么来吸引人們参加劳动生产呢？也許可以依靠人們的“热情”吧。但列宁指出，建設新的社会，“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利益，依靠个人兴趣，依靠經濟核算……”。①在揭露托洛茨基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則时，列宁強調指出：“突击工作是一种优待，而没有消費的优待是不存在的。……突击工作上的优待也就是消費上的优待。沒有优待，突击工作就是空想、泡影，然而我們毕竟是唯物主义者。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談到突击工作，那就得拿出面包、衣服和肉类来……”②

难道还不清楚嗎？对于唯物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按劳分配的原則中，無論如何是找寻不到什么消极因素的。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謂按劳分配原則的“两面性”問題。

也許有人要提出反駁：在按劳分配原則中所反映的資產階級式的权利，总不能不承認是按劳分配原則的消极因素吧？

是的，馬克思和列宁在談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則时，都曾肯定其所反映的資產階級式的权利这一点。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所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式的权利的残余，應該怎样理解呢？

如果我們在肯定按劳分配原則中反映着資產階級式的权利同时，也肯定“不能把权利形式同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实质混为一談”（赫魯晓夫）；那么，我們就不会把資產階級式的权利残余当作是按劳分配原則的消极因素。因为資產階級式的权利承認生产資料的私有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九〇九頁。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十頁。

制，而社会主义則变生产資料私有制为公有制；資产階級式的权利承認不劳而获，多劳少得的原則，社会主义則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和資产階級式的权利在社会关系的实质上的根本区别。因此，在这个問題上，我們應該理解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則只是还不具备条件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而不是按劳分配原則本身具有什么消极因素。这本来也是不难理解的道理：辯証唯物主义要求我們，在認識某一客观事物的时候，不应当在关于这一事物的概念中加进任何非它所固有的东西。

### 削弱它，冲毀它？还是积极地利用它？

那么，我們不是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嗎？不是要以按需分配原則代替按劳分配原則，以便最后实现最理想、最合理的分配原則嗎？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得不逐漸削弱或冲毀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則。据說，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吃飯不要錢”、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就是逐漸削弱或逐漸冲毀按劳分配原則的結果。

我們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論者，又是不断革命論者，当然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停滯不前，不能滿足于按劳分配的原則；所以，要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以按需分配原則代替按劳分配原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認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則，是由于后者被逐漸削弱或逐漸冲毀的結果，那是在理論上和在实践中都是毫无根据的。

列宁在“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闡明和发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过渡的学說，指出：“人类从資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資料公有和按劳取酬。我們党看得更近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漸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即按需分配。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既然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經濟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就只能理解为社会主义經濟的加强和发展；苏联和我国的实践表明，共产主义的物質条件和精神条件，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逐漸成长起来的。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原則問題，也就不可能是在逐漸削弱或逐漸冲毀按劳分配原則的基础上出现按需分配原則。因此，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过渡，不但不是通过削弱或冲毀按劳分配原則，而是通过积极地利用按劳分配原則，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劳动量和消費量的严格监督，通过坚决地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来刺激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創造物質条件。以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吃飯不要錢”、工資制与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來說，實質上也正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經濟規律起作用的結果。虽然这里已經出现了按需分配的因素，而且将来还会逐漸发展，但这不是按劳分配原則被逐漸削弱的过程；相反的，这是充分利用按劳分配原則的过程。正如常言所說的“瓜熟蒂落”。“蒂落”是瓜熟的結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是被逐漸削弱了，当然就不会有什么“瓜熟蒂落”。同样的道理，如果不首先从农民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物質利益的关心去理解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去理解去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以为农民已經不要按劳分配，已經不关心物質利益了，并以此为根据而采取“一律拉平”的做法这只能导致平均主义而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所以，那种以为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前进，按劳分配原則、物質利益原則将逐漸削弱或逐漸冲毀，那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观点。

这里还必须进一步来探讨按劳分配原则、物质利益原则会不会影响或者限制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问题。这也是那些硬说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着消极因素的人的重要论据。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按劳分配保证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生产的成果，并刺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它还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使人们习惯于社会主义纪律，使劳动成为普遍的和必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劳动热情越来越高，对劳动的精神刺激也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物质利益上的关心，觉悟的提高和习惯，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千百万劳动人们的生活需要。

可见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对劳动者起着物质利益的刺激作用，而且还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使劳动从谋生手段逐渐成为生活需要，而这正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那种以为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以他们减少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为前提，那也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观点。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具体分析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不同质的规定性同时，指明：“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靠什么来创造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呢？难道离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离开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会得到比社会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吗？而所有这一切，绝不是削弱或冲毁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而是积极利用按劳分配原则的结果。越是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越能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按劳分配原则才有可能逐渐过渡到按需分配原则。积极地利用它，正是为了最后代替它。如正我们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理一样。

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逐渐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的过渡，最后以按需分配原则代替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积极地利用它，而不是逐渐削弱它或者逐渐冲毁它。

## 政治挂帅与按劳分配原则

政治挂帅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从我国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从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具体表现，是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因此，要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必须政治挂帅。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理解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中的政治挂帅问题呢？对这个问题，显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既然认为按劳分配原则有其消极因素，那么，政治挂帅就是要从政治上来克服这种消极因素所起的作用，既然认为物质利益原则助长了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挂帅就是要从政治上来防止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但是，如上所述，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不存在什么消极因素，也不产生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因此，这样来理解在贯彻执行

按劳分配原則中的政治挂帅，显然是挂空了的。

如果我們承認按劳分配原則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合理的分配制度，那就應該認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挂帅并不是要給按劳分配原則外加一点什么东西，而是要从政治上来保證按劳分配原則的正确貫徹执行，即既不在貫徹执行按劳分配中造成人們的物質生活的不合理的差別，又不在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中产生平均主义傾向。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須承認差別；因为差別正是按劳分配原則作为提高生产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的基础。但是不合理的、脱离实际的差別，却可能形成社会的等級观念，破坏人与人之間的同志式的关系，扩大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从而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平均主义傾向則从另一个方面扩大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因为它反对多劳多得，反对對人們的劳动量与消費量的监督，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當我們的社会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社会遺留下来的斑痕，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还没有从人們的意識中消除出去的时候，总是有些人对于个人物質生活資料貪得无厭，而另一些人則对于平分一切財富很感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沒有政治挂帅是不可能正确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的。

那么，什么叫政治？怎样挂法呢？“紅旗”的社論告訴我們：“什么叫政治呢？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这首先就是承認并且坚持社会主义原則，既反对右傾保守主义，又反对左傾冒險主义，并且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正确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則，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則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sup>①</sup> 如果我們不是从抽象的意义而是从具体的意义来理解政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中的政治挂帅，并不是从外面加些什么，而是要保證这一原則的正确貫徹执行这一道理。当然，这还只是問題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还必须認識到，按劳分配原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能够鼓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能够使劳动逐漸成为人們的生活需要；但是它还不能使人們認識到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理想，認識到个人的目前利益和集体的长远利益之間的正确关系。前些时候，有人把計件工資制說得一錢不值，其实，对于那些只顧个人的眼前利益的人，什么工資形式都是一样。“計件工資打冲鋒，計时工資磨洋工”就一語道破。对于这样的人，主要的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改变分配原則或改变工資制度。“因此，在关心群众物質利益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以便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在劳动中的主动精神和創造精神。”<sup>②</sup> 这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在貫徹执行按劳分配原則中的政治挂帅。这一方面，具体地反映了作为經濟的集中表现的政治与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經濟之間的辯証关系。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經濟規律，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客观存在，加以美化或僵化固然應該反对，毫无根据的加以丑化更是應該反对。讓我們更好地認識它、依靠它，积极地利用它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服务。

<sup>①</sup> 引自“紅期”一九五九年第六期社論：“在人民公社中貫徹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則”。

<sup>②</sup> 同上引。



# 坚持“理論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則

梁 克

自从去年掀起全党全民学理論的高潮以来，理論学习方面，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况。理論学习的范围，已由机关干部、知識分子，扩展到广大的工农群众。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农民，对理論学习大感兴趣。并有些人已把理論学习养成了习惯。目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工农学理論在普及的基础上继续提高。为此，就有进一步对当前工农学习理論中存在的一些学习方法上的分歧意见和問題，展开探討的必要。这些問題，我认为：主要集中在对“从实际出发学理論”的不同的见解以及系統的基本理論学习和“做什么，学什么”之間的关系的認識上。曾經有人把先摆問題，鳴放、辯論、抓住矛盾，再閱讀文件、書籍，然后以之分析解決問題，或先鳴放，摆問題，再閱讀，然后再展开爭辯的方法，称之为符合“实际——理論——实际”的从实际出发的公式，而把“先生講”“学生听”，或先看书本再展开討論的办法，认为是从概念出发的“理論——实际——理論”的教条主义公式。这样的理解“从实际出发”学理論，显然是从形式看問題。因为它只能說明学习的具体方法和具体步驟从何入手的问题，并不能說明“从实际出发”学理論的实质問題。

“从实际出发学理論”，我的理解是指：理論和实际相联系的学习方法，这是理論学习的根本原則，也是根本方法。这虽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然而，分歧意见还是存在，其所以产生却正根源于对这一問題的不同见解，或者是理解得不够全面。毛主席說：

“……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和实际联

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們天天講‘联系’，实际上却是講‘隔离’，因为他們并不去联系”<sup>①</sup>。可见，理論和实际相联系的学习原則的精神，并非所有学理論的人和所有的理論工作者都已深刻地領会和全面掌握了。从实际出发学理論的問題，其关键是在于学习过程中，理論和实际是否已經相結合抑是互相隔离，一句話，就是是否已經做到有的放矢。毛主席指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来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sup>②</sup>我們学习馬列主义理論的目的，是在于領会貫通其精神实质，即运用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結合当前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存在的实际問題，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問題发展的规律，抓住关键所在，提出解決問題的办法，从而得出正确的結論。这样既解决了实际存在的問題，又使实际經過分析研究上升到理論。使零碎的、片断的感性知識上升到条理的、系統的、科学的理性知識。因此，衡量理論和实际是否联系的标尺，就是：“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sup>③</sup>反之，不是犯了教条主义就是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1—842頁。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42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37頁。

驗主义。所以，学习馬列主义理論必需認真讀書，要通过粗讀、細讀、精讀的各个阶段，要反复多次，直至弄通理論的精神和实质，然后再运用于实际，以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故而，学习是要下苦工夫，絕不能滿足于浏览一两篇，只知其大概便泛泛地联系实际的这种肤浅的学习情况。当然，在工农学理論的热潮才展开的情况下，我們总不能过高地、机械地要求他們“先精通而后联系”，这会使他們对学习理論，望而却步。因为：（1）文化条件还在限制着他們閱讀、钻研，而且目前还没有編出适合于工农学理論的一定数量的通俗讀物。（2）工农群众对理論学习还没有完全养成习惯，还不善于条理地、系統地运用书中原理解析研究实际问题，只能想到那說到那，确实有些零碎片断，这是学习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书中的原理，他們能掌握一两点，經過集体討論，能說明或解决一两个問題，那就是有了几分成績，就要予以表扬。但我們絕不应以此为滿足，应该加强輔導力量，引导他們多讀書，使之养成爱好讀書的习惯，同时，尽可能做到逐段逐节的給他們讲解，如此，反复多次，在一定時間內，他們就会养成独立閱讀的能力，有了自学的 ability，学理論的难关便可攻破。他們一旦掌握了理論学习的钥匙，学习兴趣便会随之而增，钻研劲头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再輔之以通俗的理論讀物，那他們領会理論的精神和实质就更容易。

用先摆工作或生产中的情况，鳴放，再閱讀书本，然后展开爭辯的办法进行学习，可以适用于：在工农还未感觉到迫切需要理論学习和对理論学习还未发生兴趣的情况。为了引导和掀起工农学理論的热潮，有必要采取这种学习方法。然而，如果把这种办法，肯定为理論学习的最好办法，甚至是唯一的办法，那就会陷于片面性，把局部的經驗夸大为全部的經驗，把个别的学习形

式代替一般的理論学习形式，这就会无形中否定了理論学习的計劃性、系統性，否定了“先精通而后运用”的理論学习原則，虽然这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况下，有它的成效，但究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既然是学理論，如果不首先弄清楚所要学的理論內容究竟是什么，要解决些什么問題，試問：根据什么来摆情况，展开鳴放辯論？难以否認的，馬列主义基本理論学习，毕竟和业务或政策方針的学习有所区别。除了基本的业务知識学习外，一般的业务学习，是根据工作或生产中存在的問題，展开討論，然后再找理論根据，这是为了直接解决工作和生产問題而联系理論，是以业务为中心，以理論为指导，并非以理論学习为中心，联系实际。馬列主义的基本理論学习，必需要有計劃，有目的要求，按部就班地进行。既然确定了学习内容，就有必要首先閱讀书本，領会其精神实质，根据內容，再摆情况，提問題，以理論的精神实质对問題展开研究分析。閱讀能力較差或尚缺乏理論基础的，最好还是先采取讲授或启发报告为主的方法，这对于輔助他們对理論內容的領会，会更深刻些，这已为經驗所証明了的行之有效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絕不能把先閱讀文件而后联系实际和“先生讲”“学生听”的办法称之为从概念出发，是“理論—实际—理論”的教条主义公式。什么是教条主义？毛主席說：“許多同志的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單純的学习。所以虽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詞句，而不会运用他們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国革命問題。这种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sup>①</sup>。又說：“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誦馬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7頁。

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sup>①</sup>可见，是不是教条主义，它的主要区别点，是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问题，而不是在于具体的步骤谁先谁后的问题。只要学习的思想和学习方法对头，采取那一种形式，都可以达到目的要求，反之，就陷入在形式上兜圈子。如果不正确掌握这一点，那就有形式和内容互相倒置的危险，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因此，对从实际出发学习理论的问题，应该正确的全面的认识和掌握。

对系统的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学习“做什么、学什么”二者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人认为：既然提倡“做什么，学什么”的学习方法，那么，系统的理论学习就无必要了，应该把它送进博物馆，因为那是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不错，“从实际出发学理论”的另一意义是指选择学习内容，应根据当前工作、生产和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定，反对那种脱离实际而单纯为学理论而学理论的偏向。例如：搞经济研究工作的不去学习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结合我国社会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党的经济政策进行学习，而去学习别的，那就是脱离实际的学习方法。这种“做什么、学什么”的学习方法，一般地说，比较适合领导干部和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或已具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人。但这仅仅是学习方法的一种，它并不能概括学习方法的全部，如果把从实际出发学理论，仅仅理解为就是“做什么，学什么”，那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那就必然会导致某些人只“专”不“红”，或只注意学习自己业务有关的理论而不对马列主义理论作全面的、系统的学习，因此，系统地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做什么，学什么”二者要恰当地结合起来，这是学习方法的两条腿走路。

至于工农群众，一方面，既要学习党的当前政策方针，同时也要有计划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打好基础，培养他们的自修能力，待基础打好，有了理论水平，便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专题选读。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不可能一步登天。在毫无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勉强要求他们作专题选读，虽然也可收某些立竿见影之效，但终非工农学理论的根本方法。应从实际出发，根据他们的水平，确定内容，订出计划，对他们理论学习的目的要求要明确，根据以往理论学习的经验，在打基础的情况下，主要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明确社会发展规律，从而确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树立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才取得的，以此坚定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坚决服从党的领导。这样的方法与要求，其效果是不大容易立竿见影，而是要在日后才能逐渐见效的。但绝不能因为见效慢，或暂不显著，便否定了它的作用，认为还是“做什么，学什么”的收效快，可以立竿见影。理论学习，绝非朝夕之间的事情，是要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不能走一步，学一步。党在战争期间，用这种系统的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的方法，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干部，因此，对当前工农学理论，应有长期的打算，全盘考虑的必要。采取系统地学，并不排斥“做什么，学什么”的方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即在打基础的情况下，前者应是主要的。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6页。

# 談談工作方法問題

龍世雄

一

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和決議的正確，以及根据党的指示和根据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和某个地区、部門的具体情况而提出的具体任务和計劃的正確，还只是解决了問題的一半，极为重要的一半，起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的一半；剩下来的問題决定于干部和广大的人民羣众。我們用什么方法去動員、組織广大干部和羣众，以充分發揮他們对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把决定下来的任务、計劃完成得好，把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和決議貫徹得好，这是极为重要的問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非常強調并不断地教导我們，要我們重視和不断地在实践中改进我們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关心羣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提到：“我們是革命战争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羣众生活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組織革命战争、改良羣众生活，这是我們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問題，就严重地摆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沒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問題，过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决方法問題，任务也只是瞎說一頓。……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

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党从来在所制定的決議中，在提出任务的同时，总是提到應該采用什么方法而不應該采用什么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正是因为工作方法問題对完成任务具有严重的意义。平常所謂“不择手段”、“乱来一通”，正是不認識工作方法对做好一件工作或完成一項任务的严重意义的表现。正因为有些人对此缺乏考虑，以致每每在日常具体工作上会有把好事办坏的事情发生。工作方法問題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問題，它是与思想方法有密切联系的。所謂正确的工作方法，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按照唯物論和辯証法办事的工作方法；不尊重唯物論，不尊重辯証法，就不会有正确的，自觉的工作方法。重視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就可以提高对工作的自觉性，减少对工作的盲目性；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提高工作质量。一九五七年全国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之后，农村在进行过两条道路的大辯論之后，出现了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馬当先的全面建設大跃进的形势。在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异常及时地提出工作方法問題，首先要全党重視和研究這個問題，以迎接一九五八年各个战綫上特别是工农业战綫上全面大跃进的生产任务。最近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提出工作方法問題，要我們学会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以便在我們国家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头一年所获得的全面大跃进这个基础上，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和超額完成。

比1958年更大、更好的1959年全面大跃进的计划。

多快好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法，一切具体工作方法都要以党的总路线为依据；每一个国家干部在对待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时所采取的工作方法，都要以总路线为指导思想。立场问题已基本解决了的同志还须进一步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很多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方法不对头。有些同志虽然干劲很大，但因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以致要碰很多钉子，多走许多弯路。当然，如果立场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的人，单在工作方法上兜圈子，也是不解决问题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马列主义的工作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一个武器只能掌握在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手上，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才能使用这个武器。许多错误的产生，有来自阶级意识，也有来自工作方法。认真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认真学习党的决议、政策，认真学习在大跃进形势当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反对和防止实际工作中的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的错误，认真学习和总结广大干部群众的正确工作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二

各级领导干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改进工作方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收获，积累了不少的經驗，这里只就个人的体会，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一) 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为了克服和防止在实际工作中犯主观片面的错误，就得按照唯物论办事，就得把工作计划置于稳妥的基础上。因此，认真深入了解情况，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机械唯物主义，它尊重客观事物，但不是客观主义者。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对客观事物敢于追求出个道理来，逢事总得问一问为什么，深入实际，为的是要发现问题；“聆听”才能“察理”，“鉴貌”才能“辨色”；不观察形势，就很难当机立断。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论的根本方法。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是每一个工作者掌握自己全部工作对象的深度的标志。如何了解情况呢？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这是扩大人们接触客观事物的面和深入事物的点，使全面情况有助于了解具体情况，使具体情况有助于了解全面情况的方法。而要深入事物的一点，这就要使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在人们初步了解一般情况的基础上，挑选有代表性的典型，全面地、系统地、对对象的本质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以使自己能把握住对象的本质，并从而概括对象的一般，把握一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们不可能采取走遍全场浮光掠影地去了解情况的办法而取得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为了克服、防止工作的一般化，采取解剖一个或几个以推及其余，既掌握点又了解面的方法，就比较稳妥可靠了。这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只能掌握一般情况，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主观性。为了做好深入了解情况，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中去。领导干部要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隔阂，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劳动群众的小学生。

是的精神，是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对客观事物敢于追求出个道理来，逢事总得问一问为什么，深入实际，为的是要发现问题；“聆听”才能“察理”，“鉴貌”才能“辨色”；不观察形势，就很难当机立断。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论的根本方法。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是每一个工作者掌握自己全部工作对象的深度的标志。如何了解情况呢？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这是扩大人们接触客观事物的面和深入事物的点，使全面情况有助于了解具体情况，使具体情况有助于了解全面情况的方法。而要深入事物的一点，这就要使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在人们初步了解一般情况的基础上，挑选有代表性的典型，全面地、系统地、对对象的本质因素进行调查研究，以使自己能把握住对象的本质，并从而概括对象的一般，把握一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们不可能采取走遍全场浮光掠影地去了解情况的办法而取得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为了克服、防止工作的一般化，采取解剖一个或几个以推及其余，既掌握点又了解面的方法，就比较稳妥可靠了。这是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只能掌握一般情况，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主观性。为了做好深入了解情况，必须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中去。领导干部要能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毫无隔阂，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劳动群众的小学生。

(二) 搞试验田。掌握了正确的情况，只是进行具体领导的前提。搞试验田，能使干部深入实际，取得实际经验以指导一般。因此这是领导方法中的以点带面，以点领导面，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好方法，是以先进带动落后，以成功经验 and 失败经验教育群众和培

养干部的好方法。如农业生产大跃进开始的时候，还只是少数試驗田获得高产，利用試驗田的經驗，跟着就带动了并且出现了大面积的丰产局面。

(三)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終評比。这个方法从工作任务的布置、检查、总结，都贯彻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精神，是下去和上来、再下去和再上来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对领导干部本身来说，这个方法可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个工作方法一方面使计划不会落空，一方面丰富了领导的經驗；一方面能及时发现問題，一方面又能巩固已获得的成果。

(四)抓两头，带中間，或抓中間推动两头。有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办法，还須注意充分全面地发动群众。在一般情况下，处于中間状态的群众总是占多数的；但中間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这又是能否完成任务的重要关键。而“抓两头，带中間”的两头，一头就是好的，先进的，或者較好的，較先进的，一头就是差的，落后的，或者較差的，較落后的。抓住了这两个典型，树立对立面，加以比較，借此进行宣传教育，以推动中間向好的、先进的学习，督促差的、落后的前进，鼓励好的、先进的更向前进。“抓中間带动两头”，以后来居上的办法把全体带动起来。这样就能全面地使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而这种方法又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是調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办法，是防止在教育群众問題上的走过场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抓两头，带中間”，“抓中間推动两头”的方法，事实上又起着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和突出具体领导的作用，因而又是实现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相结合的好方法。

(五)鼓足干劲，留有余地。这是既保証完成任务，又有群众回旋余地的领导方法。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須尽可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但也必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

把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精神结合起来。如提出十分指标，采取十二分措施和二十四分干劲作为保証。既注意了客观可能性，又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是客观条件允許做到十分的决不做到九分九；另一方面是留有余地給广大群众去爭取超額完成任务。既充分发挥了群众自觉的苦战，又照顧到群众的休整；既可以防止右傾保守，又可以防止急躁情緒。只有这样，才能长期維持群众的高度革命干劲。我們还采用了“两本賬”的方法，既提出了高的要求，以便尽可能发挥群众革命干劲，向高指标进军；但也提出一个較低要求。用高指标去保証低指标的实现，有努力目标，也有个保险的系数。这就保証工作规划既先进又落实。

### 三

我国生产大跃进的形势既不断地克服了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論观点——主观性，丰富和发展了辯証的唯物論，也同时不断地克服了实际工作中的形而上学观点——表面性和片面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的辯証法。片面性和表面性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是主观性的工作方法。“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們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他們，不認識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認識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矛盾論）我們在工作上的錯誤，一般來說，除了来自立场意識問題方面以外，更經常地是来自思想方法問題方面。所謂思想方法不对头，就是指人們的思想方法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不按唯物論办事的主观性和不按辯証法办事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为着避免和减少在工作方法上的錯誤，就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的錯誤，要坚持唯物論的思想方法；就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

性的錯誤，要坚持辯証法的思想方法。

在此，我想着重談談下面的几个問題：

(一) 兩點論。兩點論的內容是极其丰富的，反映了“統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如事物的矛盾和統一、質和量、肯定和否定，本質和現象、內容和形式、原因和結果、必然和偶然、可能和现实等等。兩點論也反映了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事物的客觀規律性的辯証原理。兩點論既是观察分析事物的唯物观点，又是观察分析事物的辯証观点。在思想方法上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往往把事物看作是孤立的，靜止的，因而往往把問題看死了，在工作方法上也就必然会造成相应的錯誤。人們應該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但是必須尊重、依据事物的客觀規律。兩點論是防止絕對化的錯誤的好方法，教人們不要抓了事物的矛盾一面而忽視事物的統一一面，或抓了統一一面而忽視了矛盾一面；不要只看事物的量而不看事物的質，或只看事物的質而不看事物的量；不要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兩點論又正确地告訴我們凡事要作全面分析，不要抓孤立一点，以点代面。比如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的認識問題，“十个指头有长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辯証法既避免了相对主义的錯誤，又避免了絕對主义的錯誤。对社会主义事业站在否定立场或抱着否定情緒的人，站在个人主义立场或抱着个人主义情緒的人，抹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設的巨大成績，抓住一个指头的缺点或錯誤，抹煞、否定九个指头的成績，这种分析事物的“方法”，首先是立场上的問題。也有对事物分析缺乏全面观点，抓了非本質的事物作为本質的事物，抓了非主流的东西当作主流的东西，抓了个别現象代替了大量的現象，这是一种絕對主义，是以否定一切为特征的絕對主义，是右傾的“一点論”。以小圈圈否定了大圈圈，以小道理抹煞了大道理，以点否定面，以矛

盾的非主要方面否定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矛盾的个性代替了矛盾的共性，“言不及义”“特殊論”等等就是这一类絕對主义的表现。另一种絕對主义，以肯定一切为特征的絕對主义，是“左”傾的“一点論”。以九个指头抹煞了一个指头，以本質的东西抹煞了非本質的东西，以主流的东西抹煞了非主流的东西，就是以大圈圈否定了小圈圈，以大道理抹煞了小道理，以面否定了点，只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只看到矛盾的共性方面。这也是不恰当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辯証法，是分析事物的全面观点，反对片面性；是分析事物本質的观点，反对表面性。

根据兩點論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制定了“兩条腿走路”的办法，利用事物矛盾的諸方面，相互促進，相互推动，求得又快又好省地、高速度又按比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兩點論更反映了事物矛盾的两方面的各向自己对立面轉化的具体条件和可能性，反对靜止地、孤立地分析事物，要善于听取反面的意見，要树立对立面，可以防止片面观点，免于思想僵化。兩點論的辯証法，指導我們更好的正确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集中和民主，紀律和自由，集体和个人，好事和坏事，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党的領導和群众路綫等等既有区别而又互相联系的关系，在經濟生活上的生产和生活、消費和积累、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苦战和休整等等的区别和联系的关系。

(二) 一盘棋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局观点，是辯証法中事物普遍联系互相制約这一规律所要求的观点。如正确处理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問題，全局和局部、大局和小局的关系問題。所謂全国一盘棋、全省一盘棋，就是說先全局后局部，先大局后小局；局部要服从全局，小局要服从大局。部門的积极性是重要的，但必須納入国家的計劃，服从国家的計劃。就是說在經濟建設上的高度的民主还必須在高度的集中

指导下行事，这样既防止了过分集中，又防止了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毛病；是充分发挥中央积极性和地方积极性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这对正确运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指导我们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高速度和按比例的矛盾，具有关键性意义。

（三）抓綱目、抓并举、抓結合。这是指导生产的相互配合相互推动以加速量变、全面跃进的工作方法，是反映高速度和按比例的客观规律的工作方法。这一套工作方法，适应了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矛盾斗争规律的全面要求。抓綱目、抓并举、抓結合，反映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反映了点与面的关系；反映了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反映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的关系。在建设中有綱有目，綱举目张，有点有面，相互促进；既有“一馬”当先，也有“万馬”奔騰，既有“元帅”又有“随从”，既有“骨干”，也有“一般”，既有“升帳”也有“註路”。这样，又可防止抓一个丢一个的“单打一”的片面性的工作方法；是正确解决多和快之間、好和省之間、多快（数量）和好省（质

量）之間的矛盾的工作方法，是执行总路綫的具体方法，是“彈鋼琴”的工作方法。

去年是大跃进的一年，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越来越重大，工作的要求也就越来越细致。但是我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懂，对很多新的事情还缺乏經驗知識，因此，有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說道：“……只有根本不作事的人才不会犯錯誤。”（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第四六二頁）这就更加要求每个国家干部能够“多謀善断”，坚持唯物論和辩证法办事，不断在实践中改进和提高工作方法和水平，加强工作的自觉性和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季米特洛夫曾說，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鋒队应该是真正百发百中的射手。实际生活比之任何公式都要复杂，也就要求我们对任何事物必須进行具体分析；“一目十行”“浮光掠影”的作风是危险的。

認真学习党中央的決議精神、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認真学习六亿人民在去年全面大跃进中的經驗总结，将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認識水平和工作方法的主要門徑。

## 广东經濟学会和广州哲学会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

广东經濟学会和广州哲学会于4月26日在广东科学館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邀請广州市計划委员会主任、广东經濟学会副会长王冕农同志作“如何正确認識目前市场供应問題”的报告。到会的听众有广东經濟学会和广州哲学会的會員共二百多人。

王冕农同志在报告中論述了三个問題：第一，对目前市场供应問題总的看法；第二，目前市场出现一些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較困难的原因；第三，克服这些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

王冕农同志在这次报告中，一方面根据政治經濟学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列举了大量的生动事例和詳尽的有說服力的統計数字來說明問題。这种既有理論又有实际，使理論与实际密切結合的、論述当前我国人民經濟生活重要問題的学术性报告，不仅有助于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而且提高了人們对于当前市场供应問題的思想認識。



# 两条腿走路与唯物辩证法

王道一

去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充分证明了我們党在八届六中全会的決議中所明确规定下来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完全正确的。繼續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針必将調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高速度的发展。

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所以正确，是因为这一方針和党的其他各項方針政策一样，是建立在对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正确認識的基础之上的，它如实的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反映了人們在变革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它是唯物辩证法在工作中的运用，也是我們在社会社会主义建設实践中丰富經驗的总结。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訴我們，客观事物普遍存在着矛盾，即存在着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正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統一规律的理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事物的矛盾統一规律，即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一规律表明：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由于内部矛盾双方斗争和統一的結果，一切事物的内部自始至终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同时这两方面又是統一的，即互相联系、互相依賴、互相影响，并且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正是由于这种对立面的統一和斗争，才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比方說，在国民经济中

的工业和农业；工业中的輕工业和重工业；工业管理体制中的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生产规模上的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生产技术上的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在领导工作中的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矛盾的統一，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正反映了各項工作中这种矛盾統一的规律，反映了对立面之間的矛盾統一的关系。事情很明显，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存在着的固定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那么我們就必须全面地、发展地来認識、处理事物，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靜止地来認識、处理事物。同样的，既然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面的矛盾和統一之中，那么，我們也就必須按照对立統一的观点和方法来把握事物，处理工作。以国民经济中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为例，一方面它們本来就存在着差别，即存在着矛盾。要提高工业在工农业生产中的比重，就要求扩大对工业生产的投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和技术設備投到这方面来，要发展农业，也同样要求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等，在一定的資金、劳动力、技术力量等条件下，对工业或农业的任何一方面的生产和基本建設，投放过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就势必影响另一方面生产发展的速度和基本建設的规模，強調了一方就必然会减弱他方，这就是工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矛盾的表现之一。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能为农业提供化学肥料，机器設

备等等，促使农业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和市场，进一步推动工业的发展，这就是工农业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统一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一面。这两方面的互相矛盾、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就是工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实行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符合工农业之间的这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的。

客观事物对立面的统一规律，还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上，如政治生活上的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统一意志和个人心情舒畅；公社生产上的统一计划和因地制宜、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以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来说，我们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充分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不断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生产发展了，才能够改善生活，生活的不断改善，又鼓舞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促使生产的更大跃进，这是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一面，也就是统一的一面。另一方面，发展生产要求扩大对生产方面的投资，提高总收入中积累的比例；改善生活则要求扩大消费的比例，增加总收入中用于消费部分的数额，这就是两者矛盾对立的一面，这两方面就是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我们认识了客观事物这种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既看到它们的统一，也看到它们的矛盾，就能够在具体安排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时更好地贯彻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保证生产的迅速发展，也关心群众生活的适当改善。存在任何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都使我们不可能正确地全面地安排群众的生

产和生活、不可能正确地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的矛盾统一规律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也是从实际工作所必需遵守的原则，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实行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是运用矛盾统一规律的范例。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期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正确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要在观察问题和处理工作中运用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避免形而上学的观点。

一般说来，只看到事物的对立的一面，容易犯“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只看到事物的统一的一面，则容易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就能够保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树立全面地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观点，既然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都存在着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对立面，那么要正确的认识事物、处理工作，就必须全面地看到矛盾的双方，而不能片面地只看到矛盾的一方。如果只看到事物的矛盾方面，而看不见统一的方面，或者只看到统一的方面，而看不到矛盾的方面，这就不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就是一条腿走路，而不是两条腿走路。

其次，要学会两条腿走路，还必须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常常有许多种矛盾同时存在。这就必须注意掌握矛盾的特殊性，对于具体问题，对于客观事物各方面的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

毛主席教导我們，不論什么矛盾，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矛盾諸方面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矛盾諸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事物的性質，正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我們对于矛盾的不同方面，就不可以平均对待。如果以为两条腿可以不分先后、可以不分主次、可以不分輕重、緩急，这就不符合事物对立統一的規律，不符合两条腿走路的精神實質。正确的貫徹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既要有全面观点、不顧此失彼，又要分清先后、主次、輕重、緩急，不能半斤八兩。

再次，要学会两条腿走路，还必須注意矛盾双方的互相轉化。矛盾的两个側面，是按照辯証法的規律运动的，它們既互相依存，互相对立，又会因一定的条件而互相轉化，“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轉化。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轉化了去。”（“矛盾論”）先进可以轉化为落后，落后也可以轉化为先进；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如此等等。我們的任务就是要看到对立面双方这种互相轉化的可能性，根据矛盾运动在各个阶段的不同情况，积极的創造矛盾轉化的条件，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設方面轉化。有时候，在一定条件下，我們有意識的强調了某一方面，目的正是想通过人們的主观努力使矛盾向着有利于我們的一方发展。

比如，当着干部、群众右傾保守思想相当严重，尚未破除迷信的情况下，我們必須强調发扬革命干劲和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当着干部群众解放了思想、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如果不及时地强調冲天干劲必須与科学分析相結合，就可能使得有些人头脑发热，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而不恰当的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但是，客观事物矛盾着的双方，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向自己的对立面轉化，因为轉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的。比如工业上的小土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向大洋轉化，离开了客观上的需要与可能条件，轉化就不可能，比如工业与农业之間，根本沒有互相轉化的需要与可能，也就不存在互相轉化的問題。

“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針，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正确的方針，但它只是为了給我們提供一个解决各項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的矛盾問題的基本方向，而不是給我們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要正确的貫徹、运用这一方針，必須对实际工作中矛盾統一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运用辯証法的原理加以具体的分析，要弄清楚什么是实际工作的“两条腿”，它們怎样同时并举，它們互相排斥的一面具体表现如何，它們互相依賴、互相促进的一面具体表现如何，怎样才能促使它們互相協調、互相促进的关系发展……等等。而不要把“用两条腿走路”胡乱的生搬硬套。这样，才能使我們正确認識和处理实际工作中的矛盾，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把工作搞好。

## 更正

本刊本年度第四期“目录”第六行“革命浪漫主义”应改正为“革命浪漫主义”；第十七行“捍卫”两字应改正为“必須坚持”。

# 全面認識和正確利用計件工資制

陳文川

去年第四季度至今年年初，我國若干省、市部分企業取消了計件工資制。由於取消的時間比較集中，面比較廣，影響比較大，引起了廣泛的注意。人們提出了不少問題，如：過去幾年曾經積極推行的計件工資制，為什麼一下子大量取消了？取消了對不對？計件工資制是否過時？它的前途怎樣？這些問題的確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

## 一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計件工資制發展的歷史過程。解放後，從1950年到1952年，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隨著企業民主改革運動的深入開展，我們對舊的計件工資制進行了改革。改革的內容，主要是：一、廢除把頭制，取消包工制，消滅了中間剝削；二、廢除了以體力最強、熟練程度最高的工人的產量為定額標準，建立了平均先進定額；三、規定了標準工資，使工人在停工期間，一般都可以拿到75%左右的工資。此外，加強了技術組織措施，防止單純提高勞動強度；建立了勞動保護制度，防止工傷事故發生。經過這些改革，使計件工資這種分配制度基本上與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發揮了它的積極作用，從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從1953年到1957年，在我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時期，計件工資制經過推行，逐步有所發展。我國工業中計件工資所佔比重1952年為35%，1953年為40%，1954年為38%，1955年為37%，1956年為41%，

1957年為36%。建築業中的計件工資制，所佔比重增長更大，1954年為35%，1955年為56%，1956年為76%。計件工資制推行以來，在鼓舞職工群眾的勞動熱情、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職工的物質文化生活、改進企業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都起了積極作用，因而促進了生產建設的發展。但是，在推行計件工資的過程中，有些地區的少數企業，曾經出現過不問條件，盲目推行的現象；在片面強調計件工資的作用的同時，一些地區和一些企業，由於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政治思想工作，使領取計件工資的一些工人在不同程度上滋長了個人主義思想，只顧產品的數量，不注意或不大注意產品的質量，挑肥揀瘦，甚至出現了少數弄虛作假、浮報冒領的現象。但是，就推行計件工資的整個工作來說，這些缺點和成績比較起來，不過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

有人認為，計件工資是舊社會的產物，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解放以後大可不必推行，或者可推行也可不推行。

計件工資和計時工資一樣，都是工資制度的一種具體形式，都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資制度。但是工資制度的社會性質，並不取決於它的表現形式，而是取決於它所反映的分配關係的性質。資本主義的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它所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即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的關係。資本家所採用的計件工資制，與計時工資制比較，的確是更加巧妙、加重剝削工人的一種工資形式。從表面上看，工人多勞，所得的工資

越多。但是，因为工人不断提高劳动强度，资本家就不断降低每件产品的工资单价，以致工人要保持原有工资水平，非加倍劳动不可。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力求用加紧劳动来维持自己的一般工资数量：多工作几小时或是在一小时内多制出些产品。……结果就是：他工作得愈多，他所得的工资也愈少。”<sup>①</sup>所以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与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sup>②</sup>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工人的劳动报酬虽然采取了工资的形式，但这种工资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它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计件工资作为按劳分配的形式之一，它正确地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社会主义原则，使工人的工资直接取决于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使工人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正确结合起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工人的工资收入也是不断提高的。我国各地企业实行计件工资以后，劳动生产率一般平均提高了20—30%，计件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平均增加10—20%。既然计件工资成为“一种提高生产的方法、工具和手段”（列宁：在第二次全俄粮食会议上的演说），并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了劳动者的生活，怎能说过去几年我国推行计件工资是错了，或者是“可推行可不推行”呢？

## 二.

过去几年行之有效的计件工资制，为什么在去年大跃进的几个月中，各地部分企业的计件工人又自动提出要求取消呢？

这件事情首先说明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教育下，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进行忘我劳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愿拿超额过

多不合理的工资，提出了取消计件工资的要求，以进一步巩固工人内部的团结，更好地发展生产。工人阶级的这种优良品质，是应该加以肯定和发扬的。但是，对于取消计件工资的原因，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

大跃进中生产条件的急剧变化，是取消计件工资的根本原因。“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在大跃进中，职工群众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发挥了无穷智慧，把机器设备、劳动组织和各方面的生产潜力大量地挖掘出来。大搞技术革新的结果，劳动效率提高很快，劳动定额不断被突破，定额的修改工作显然一时无法赶上去，计件工人的工资收入激增，和计时工人相比，日益悬殊；有些企业的职工在一个时期内自动加班加点，有些在星期日也不休息，计件工人加班愈多，工资收入愈多；计时工人虽然同样加班加点，但工资是固定的，收入未起变化。这样就使计件工人与计时工人的工资收入呈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计件工人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多干了不好，少干了也不好，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地位。为了解决矛盾，争取主动，计件工人提出取消计件工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大跃进中，由于大量劳动力调动频繁，各方面的协作加强，生产任务的改变，新机器的采用，新产品的增加，原材料供应的变化，等等，这就使原来为工人所熟悉的工作，现在变成不熟悉了，旧的劳动定额显然是不相适应了，而新的定额一时也摸不准，来不及制定。因此，以个人活动和旧的劳动定额作为基础的计件工资，自然是无法实行了。

计件工资本身的缺点，也是它被取消的一个原因。去年各地工人展开了一场关于计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第一卷，第80页。

<sup>②</sup>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本684页。

件工資問題的大辯論，集中地暴露了計件工資的缺點。這些缺點和它的特点是直接聯繫起來的。它的特点在於把勞動成果和勞動報酬直接聯繫起來。它的特点除了有其積極作用之外，也決定了它的短處：一，使勞動者多關心個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關心或少關心整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多注意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不注意或少注意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二，容易產生片面追求產品的數量，忽視產品的質量的傾向；三，擴大了工人之間特別是計件工人和計時工人之間的工資差額，影響工人內部的關係；四，定額管理和工資計算等工作較繁雜，定額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往往跟不上形勢的發展。這些缺點，在條件未變化以前，在某些企業中就已經存在，而在大躍進中，條件發生急劇變化以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在上述情況下，計件工資在許多企業（當然不是所有的企業）中已經不是“提高生產的方法、工具和手段”，甚至走向它的反面，變成阻礙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和阻礙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的絆腳石了。可見，在去年大躍進中比較集中地取消或暫時停止實行計件工資制，是客觀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符合多數計件工人的主觀願望的。這種作法是正確的。事實證明，取消了計件工資的多數企業，凡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的，生產都增長了，工人內部團結也進一步加強了。同時，由於工人對計件工資的缺點進行了一次生動具體的總結，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全面認識這一工資形式的局限性和兩面性，以便今後可以更正確地利用它來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至於有些地區少數企業盲目取消了計件工資，影響了生產，這畢竟是支流，不是主流。有人認為取消計件工資是平均主義。這不符合事實。實行計時工資，仍然有等級差別，仍然是按勞分配。

但是，在去年取消計件工資的高潮中，有些人完全否定了計件工資的優點，誇大了

它的缺點，並說這些缺點是無法克服的。

計件工資的優點是不能抹殺的。第一，和計時工資比較，計件工資在一定的條件下，體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原則更加直接、簡單、明了，它使勞動者從物質利益上關心自己的勞動成果，更充分地發揮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關心提高自己的熟練程度，學習先進操作方法，因而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二，促使勞動者加強勞動紀律，充分利用和節約時間。第三，促使勞動者充分利用生產設備，提高設備的利用率。第四，促使企業改進管理制度和勞動組織，減少企業的定員人數，節約勞動力。這些優點表明，在一定的條件下，計件工資就會成為一種能夠比較好地體現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鼓勵原則的一種工資形式。列寧在談到加強勞動紀律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時候，曾經着重指出：“在這方面應該實行計件工資制，採用泰羅制中許多具有科學和進步意義的方法，使工資和工廠的工作總額相適應，和鐵路、水運等的經營額相適應。”<sup>①</sup>

計件工資的缺點，只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貫徹群眾路線，不斷改進定額和企業的管理工作，都是可以克服的。

### 三

我們分析去年取消計件工資的原因，指出了它的缺點和局限性，得出的結論是：取消和停止是必要的，正確的。但是，能否得出結論說：計件工資在我國社會主義階段已經過時，失去作用，應該進歷史博物館呢？

在社會主義階段，社會總產品中用於個人消費的部分的分配，是根據“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規律。“按勞分配”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

<sup>①</sup>“列寧論勞動”，工人出版社，1956年說，第379—380頁。

重大意义，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详尽的说明。

实现按劳分配，需要有一定的形式。就工资制度说，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是两种基本工资形式。计件工资不过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态，前者是以后者作为基础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工资报酬的尺度；后者以劳动生产物的数量和质量为计算工资报酬的尺度。两种工资形式都承认差别，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既然承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而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又都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基本工资形式，为什么排斥计件工资，否定它的作用呢？

有人说，计件工资与我国去年生产大跃进不相容，今后我国还要继续大跃进，所以1958年是计件工资发展的转折点，1958年以后就要消亡了，今后新建的企业，都一律不再采用计件工资了。

应该看到，在去年大跃进中，全国各地实行计件工资的企业，只有一部分取消或暂时停止实行（即所谓“冻结”），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仍然继续实行，却并不影响生产继续大跃进。有些企业暂时停止实行计件工资后，现在又相继恢复了。这说明计件工资还有作用，并非与生产继续大跃进不相容。我们分析去年取消计件工资的原因，指出条件的变化是基本的。这些变化，如劳动力的大量而频繁的调动，劳动组织的巨大改变，加班加点等等，都是暂时的现象，而生产的定型化、标准化，却是今后生产发展的一个方向。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虽然是今后持久发展的群众运动，但是，它的发展和其他事物发展的规律一样，是有节奏、波浪式前进的。企业扩大和新机器采用，新产品投入生产引起产品规格的变化，使旧的劳动定额不相适应，今后只要继续摸索，积累经验，及时制定新的定额，计件工资仍然可以适应新的形势。其实，作为工资制度的两

种基本形式，计时和计件，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是可以而且应该互相转化的。在一个时期，可以把计时工资转化为计件工资；在另一个时期，也可以把计件工资转化为计时工资。在过去几年中，计时和计件这两种工资形式在某些企业中也曾互相转化，如上海的纺织工业，1958年大跃进以前，由于企业内部发生新的情况，曾三次“冻结”，实质上就是由计件转化为计时；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将计时转化为计件。我国计件工资的法规允许企业根据需要，自行转化和改变工资形式。这种转化和改变并不改变工资的性质。总之，今后我国继续实现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是肯定的，而计件工资仍然继续发生作用，它和计时工资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说计件工资有积极作用，它和计时工资可以同时并存，并不等于说它可以无条件地被普遍采用，或是在任何时候采用它都会有利。采用计件工资，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1.能够制定出比较准确的反映工人劳动消耗量的定额，并能进行计算统计；2.在一定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的前提下，工人经过努力，有可能提高效率和增加产量；3.能够制定出产品质量标准，而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工人的技术水平或熟练程度；4.要有严格的计件管理制度，包括质量检查制度、定额修改制度、统计制度等。上述条件就决定了计件工资形式的局限性。在手工操作和机手并用的工种中，采用计件工资是比较适宜的。因为产品的产量决定于工人的体力、手工技巧和熟练程度，实行计件工资，对于劳动效率提高和产量增加，是有作用的。如果是机器生产，只有当机器还是单个地活动，尚未组成为联动机，生产尚未自动化的时候，计件尚有作用。在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粗壮工人，可以采用计件工资制。此外，在分散劳动的家庭工人中，由于工时难以统计，其劳动消耗量又无法进行监督，采用计件工资是最适宜的。下列生产

部門不適用計件工資：1. 電力、化工等生產過程連續性很高的生產部門，由於生產定額無法制定，不能實行計件工資；2. 紡織業的細紗車間、機械業中某些專業車床等，由於產品產量受到技術操作規程和生產設備的限制，採用計件工資作用不大；3. 生產過程高度機械化、自動化的企業、車間和工段，實行計件工資沒有意義，因為收不到什麼經濟效果；4. 某些質量要求特別高的和技術要求特別複雜的產品，實行計件工資是不適宜的。至於今後新建的企業，只要這些企業具備實行計件工資的條件，實行這種工資形式對生產更有利，為什麼不能採用計件工資呢？

#### 四

如上所說，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是我國貫徹按勞分配的兩種基本工資形式。這兩種工資形式各有自己的特點和優缺點。在一定的條件下，計件工資比計時工資更直接地反映了按勞分配的要求，物質鼓勵作用較大，更能體現同工同酬的原則。但實行這種工資形式有局限性，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而計時工資卻有較大的靈活性，產品質量較易得到保證。但它不易鼓勵增加產量，體現按勞分配不如計件工資直接和明顯，物質鼓勵作用也不如計件工資大。由此可見，兩種工資形式的好壞，都是相對的，都是有條件的。問題在於正確地運用。所謂正確地運用，就是根據不同時間、地點和條件，根據各種不同的生產特點和生產變化的情況，靈活掌握，慎重地採用不同的工資形式，或者由使用這種工資形式改用另一種工資形式。所以，關於計件工資的前途問題，應該這樣看：從計件工資的特點和優點以及它所適用的範圍來看，無論在农村和城市，它今後仍然有廣闊的“用武之地”。既然我國經濟還很落后，在工業中，要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同時並

舉，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並舉，這幾個並舉和城鄉工業遍地開花，就決定了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工業必然是自動化、機械化、半機械化、手工勞動等等各種類型的生產方法同時存在。目前我國工業生產機械化程度很高的並不多，自動化生產則更少，大多數企業的生產方法是手工勞動和半機械化生產。以工業比較發達的上海為例，現有工業企業中，從事機械化操作的僅占27%，半機械化操作的占36%，手工操作的占37%。<sup>①</sup>要把半機械化和手工勞動改為機械化和自動化，徹底完成技術革命的歷史任務，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因此，適用於計件工資的企業、車間和工段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多的，適用的時間不是很短，而是相當長的。就農村而言，在去年大躍進中，農村人民公社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這種分配制度，雖然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但是它的基本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即基本上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所以，工資部分，即按勞分配部分，在一段時間內，占著主要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建設長時期內仍然占著重要的地位。工資部分既可以採用計時的形式，也可以採用計件的形式。可見，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並不排斥計件工資。事實上，目前農村人民公社行實的“死級活評”，實質上就是某種類型的計件形式。

總之，計件工資在我國技術落后的條件下，在今後一定的時期內，在农村和城市，仍有廣泛採用和發展的余地。而隨著生產過程的機械化、自動化程度逐步提高，社會產品逐步豐富，社會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按需分配”的成分逐步增加，計件工資適用的範圍將會隨著“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的削弱和消亡而逐步縮小，以至最後消亡。

<sup>①</sup> 柯慶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的報告，見1959年2月26日人民日報。



# 对取消計件工資問題的一些看法

李 中

去年大跃进以来全国各大城市的許多工业企业中相继取消了計件工資，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討論計件工資問題的文章，但到目前为止，对取消計件工資的問題，看法还是很不一致的。有些同志对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的作法基本上采取不以为然的態度，认为实行計件工資制所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工作上有缺点所致。也有許多同志认为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的作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取消的具体原因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大跃进中所产生的一些暫时的因素所致，有的同志則认为主要是計件工資本身存在着缺点。由于对以上問題各有不同的看法，也就給計件工資制摆出了不同的命运。

在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是工人自己提出来的。目前，計件工資在各种工資形式中所占的比重是大大縮小了。半年来，取消計件工資的許多工业企业中工人之間团结和生产协作大大加强，生产繼續跃进，情况基本上是好的。我认为在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的作法，基本上是对的。为了闡明这种观点，就有必要認真分析一下在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的原因。

讓我們首先考察一下計件工資制本身的特点及与此特点相联系的一些积极与消极作用。

計件工資的特点是工人取得的报酬与他所生产的在一定质量标准下的产品数量成正比关系，与其他工資形式比較，它使工人取得的报酬与其劳动成果間建立起了最直

接的联系，它最突出地体现了物质利益原則。計件工資的积极作用就是从这个特点产生出来的。但这种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之間的正比例关系，是以一定的劳动定額为基础的。而国家为了不断地增加积累，为了合理安排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資关系，也需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定期地修改定額。每修改一次定額虽不是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工資水平，但工資水平的增长要受国家計劃的限制，实际工資与修改前比較必然是降低的，特别是在生产发展快或原定額比較保守的时候，因此工人就称計件工資为“韭菜命”，意即长了就割，上海有些工人叫定額員为“剃头师父”。这种情况反映到工人思想上来就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刺激工人努力劳动，充分利用工时，努力提高自己的熟練程度，愿意学习先进經驗，改善操作方法，找窍门，挖潜力；另一方面它又往往会使一些思想觉悟还不够高的工人对修改定額产生某些抵触情緒，总希望定額訂得低些。为保持已得到的物质利益，生产积极性发挥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又有某些保留，不愿将自己的生产窍门告訴別人；为避免生产条件的改变，一些工人对掌握先进技术，对新产品試制，对調动工作会表现得不够积极。特别是手脚較慢的工人，担心手脚快体力强的工人突破定額太多，新定額定得太高影响自己的收入，因而在他們之間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当我们这样指出計件工資制这种消极作用时，还必须指出，工人自动地要求修改定額，并且比领导上制定的定額更为

先进的事例也是不少的，虽然和领导上主动去修改定额比较起来还是少数。

另外，计件工资在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计件工资确实最能体现物质利益原则。物质利益原则虽反映着按劳分配这一经济规律的要求，但不能说按劳分配的要求仅就是物质利益原则。不能认为只要充分强调了物质利益原则，就能全面体现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按劳分配的规律要求按照劳动的尺度合理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这当然就要承认差别，承认由于劳动者个人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同，报酬有多有少的差别。但必须使这种差别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同工不同酬，过大过小的差别都会违背按劳分配的要求，产生消极作用。计件工资使工人所得的报酬与其完成的在一定质量标准下的产品数量成固定的正比关系，非常灵敏地体现着差别，这就充分体现了物质利益原则。但由于人们的工作条件不同，这就往往会带来不合理的差别，有人叫计件工资为脱缰之马，所谓缰就是这种在分配上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我们试从下面两种关系上来分析：

#### 一、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的工资关系。

在同一企业中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的劳动是互相配合互相衔接的，一定时间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个人。如广州全新针织厂计件工人多的成衣车间，其机器维修和半成品原料的供应完全依靠保全工和织布车间漂染工段（这些都是计时工）支持。但是计件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一般都比计时工人增长快，拿全新针织厂1956、1957年两年工资水平的比较来看，计件工人的工资1957年比1956年平均增长了11.96%，计时工人的工资同期只增长7.39%，但平均熟练程度计时工却比计件工为高。计时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全系自然增长率（工人的升级、调动等）；计件工人的工资增长则主要是超额工资。大跃进以来这种不够合理的

差别就更大，如1958年第一季度计件工平均工资比计时工平均工资高达14.53%。取消计件工资前已有不少计件工人工资在100元以上，少数甚至拿到180元，而计时工人收入基本未动，一个老保全工感慨地说：“我们满身油污作了十几年，还不如一个锻骨工（计件工人）”。这种情况，就大大影响了计时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二、在计件工人之间，也往往因为各工种的定额不平衡，有肥有瘦，以致在从事这些不同工种的计件工人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矛盾。如广州210工厂有一个姓符的女工说：“我这工种超额拿六十元，她那工种也同样超额却拿八十元，工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常常有争吵”。这样就会有挑肥拣瘦不能实行专人专品种的情况。

以上，我们指出了由于计件工资制是以一定劳动定额为基础，按产品的数量来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的，并与这一个劳动定额的制定和修改相联系，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我们知道，要科学地制定一种合理的劳动定额，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如生产相对的稳定性，有正确的技术测定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很难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劳动定额来。大跃进形势的出现，正是在这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工具、设备和不同规格的原材料的采用，操作方法的重大改变，工艺程序的巨大变化和劳动组织的不断改变等等，难于进行正确的技术测定，使制定作为计件工资基础的劳动定额，成为非常困难的问题。条件改变而定额未及时修改，或修改后不够正确都会造成许多矛盾。朝定暮改也不能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如广州全新针织厂去年六月修改定额之后五天平均都超额了，定额的经常修正会使劳动工资的工作过于繁琐，定额的平衡和合理更不容易保证。这就导致了计件工资的缺点和矛盾的加深。

大跃进形势的出现，还在工人们思想上带来极其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分配的

具体形式总会或多或少对工人的思想状况有所影响的。計件工資是按个人（或按小組、按班，范围太大了就失去計件工資的效果）計算的，工人就較多地关心个人（或班、組）的生产，把生产看成个人的事。“作活拿錢，不作活不拿錢”好象生产好坏都与別人无关。过去手脚快的工人因怕別人諷刺要錢不要命，甚至会故意要少干点。可是大跃进的出现，人們觉悟提高，人人鼓足干劲，个个力爭上游，工人干劲冲天，苦干实干巧干，挖潜力，找窍门，充分利用劳动時間甚至加班加点，大量而且高度地突破定額，有的工人拿到很高的工資。但工人們对待計件工資的态度，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有了很大的改变。有許多工人不仅沒有把这些过高的工資看作是个人劳动应得的报酬，而且由于觉得这是劳动定額不合理而造成的，反而觉得是一种思想負担，特别是当他們把自己的工資高度增长与計时工的工資基本不动作比較的时候，更觉得計件工資对自己是一种束縛，因而紛紛主动提出要取消計件工資，以解决矛盾。这些就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使取消計件工資变成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我認为大跃进中生产条件的变化太大而且頻繁和計件工資要求条件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使計件工資本身的缺点和局限性扩大了，再加以工人思想觉悟的大大提高自动提出取消計件工資，这便是大跃进以来取消計件工資的客观基础。因此，当时普遍取消計件工資，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是一种合理的需要。因而取消計件工資是基本上正确的。

大跃进中所产生的这些因素是否都是暫時起作用的？解决这个問題，对今后我們怎样对待計件工資，是有意义的。我認为有一些是暫時起作用的因素，如加班加点，这只能在短时期內被允許；生产上新的改革被采用时所造成的生产条件的新变动，也是暫时的，采用之后一般会有一个相对的稳定

时期。但有些因素会是經常起作用的，如工人的觉悟普遍大大提高，和在工业企业中大鬧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的条件下，生产条件的变化还可能經常出现。

我認为目前企业中团結协作之风大大加强、生产繼續跃进并不是一个暫时的现象，取消了計件工資的工人的生产情緒必不会持久的“預言”，不见得是对的。当然这并不否認这样的情况，有些企业中計件工資所引起的矛盾并不大，生产基本上是稳定的，工人並沒有取消計件工資的迫切要求，只是干部們图省事，随大流就取消了，因而带来了不良后果。有些企业取消計件工資只是由于支援炼鋼、人員調动頻繁，加班加点等暫時性的因素。当生产条件正常下来，工人有恢复計件工資的要求时，再考虑恢复計件工資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一看见出现了一些問題，不加具体分析不努力改进工作就立刻恢复是不对的，这不见得有利于生产，也可能會損伤工人的政治热情。

这样集中地談了計件工資的缺点一面，不利于实行計件工資的条件一面，目的只是为了說明在大跃进中普遍取消了計件工資，并不是由于主观愿望一时冲动，而是有它的客观原因。从而說明我認为在大跃进中取消計件工資的作法是正确的观点。当然，計件工資还有积极的一面，优点和缺点都是相对而言的，与計时工資（包括計时加奖励）比較，它也有鮮明的优点：它刺激工人密切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更能够督促工人充分利用工时，而不要什么特別的劳动紀律。在这些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看得很明显的：工人早来晚归；提前上班将生产工作准备好；为了在单位時間內更多生产一些产品充分發揮了工人能力所及的那种劳动强度，愿意学习先进經驗，不断改进自己的操作方法等等。它沒有在工人觉悟不高时所常有的那种劳动紀律松弛、懶汉思想，和人来的多活出的少的

现象。广州市基建部門1954年全面推行計件工資之后大約半年時間，工效就提高了一半。撫順重型机器厂隨着計件工資的推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55年第一季，計件工人占生产工人总数13.5%，設劳动生产率为100，第二季計件工人数占24.8%，劳动生产率为153；第三季計件工人数占30.6%，劳动生产率为183；第四季計件工人数占48.3%，劳动生产率为219.4。到1956年全年劳动生产率为254.1。这說明了計件工資是有很多好处的。我認为，只要我們努力改进工作，認真掌握計件工資制的特点和要求，消除一些会加深計件工資本身消极一面的工作上的缺点，在生产条件具备推行計件工資的企业中，利用計件工資形式还是必要的。

究竟那一种工資形式最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应籠統地作結論，要根据具体条件，細致分析，还要作深入的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对于今后应该采用那种工資形式的問題，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不过，从大跃进以来的发展趋势看，在許多大工业企业中，采用計时加綜合奖励的工資形式更为群众欢迎，因为这种工資形式能較全面地体现按劳分配合理地利用物质利益原則，又能加强生产上协作和工人之間的团结。它的特点是比較全面。計时工資加綜合奖励更有利于团结协作，这不仅因为它将协作规定为奖励的条件，而且因为它不象計件工資那样，使劳动报酬和产品的数量結成固定的比例关系，这就消除了工人之間在分配关系上产生矛盾的这样一个基础，工人团结协作的积极性必然会更好地發揮出来。它的奖励的标准不仅要求数量多，而且质量要高，这就比計件工資在一定的质量标准下，只刺激工人努力提高产品的数量，忽視产品质量的局限性表现出更多的优越性。我們知道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更好地滿足人民生

活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經濟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优越性之一。計时工資加綜合奖励符合了这个要求。綜合奖励还鼓励工人努力节约原材料，在实行計件工資的条件下，工人偏于求快，研究琢磨如何节约原材料較少，往往大材小用，优材劣用，实行綜合奖励就更有利于节约原則的贯彻，这特别是在大跃进中生产資料供应比較紧张的时候，就具有更现实的意义。綜合奖励使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結合起来，将工人的生产劳动和思想进步統一起来，这就不仅消除了計件工資将物质利益原則过于强化所产生的那些消极作用，也弥补了单纯計时工資由于缺乏鼓励，减弱差别所表现的那些缺陷，特别是它可以更好地加强工人的劳动光荣感。一个月或一季度一次的評奖实际上就是一种竞赛評比，它对生产的推动将更加深刻有力。

計时工資加綜合奖励制运用起来也比較灵活，它可以随各个时期的政治經濟任务掌握不同的重点，掌握不同的标准，在生产任务紧时我們可以将奖励額定得高些，奖励的面宽些；任务不太紧时我們可以将奖励額定得低些面小些；在对产品的质量要求高时，我們可以偏重于质量条件；在原材料供应紧张时，我們可以多强调整约和提高质量，等等。当然这不是說不需要规定一定的范围，不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則。这些都还需要作細致的研究，不断地摸索、总结，但再不会象脫繮之馬似的那样难于駕馭了。当然它实行起来还是需要做許多細致深入的工作，并不象取消計件工資时所想的那样简单，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劳动还没有成为人們乐生的第一要素，只要劳动还需要监督和鼓励，非常簡化的分配形式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迫切的問題，是有破必須有立，新的工資形式要赶快建立和健全起来。

# 再談国营企业間生产資料的交換关系

孙 孺

国营企业内部之間流轉的生产資料是不是商品？这是国内外經濟学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問題的討論中，意見分歧最大的一个問題。在我国經濟学界最近的討論中，歸納起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是商品；第二種意見認為實質已經不是商品，只保存着商品的形式或外壳；第三種意見認為已經不是完全的商品但帶有商品性質或微弱的商品性。看来，分歧的意見一时还不可能趨于一致。由于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理論的需要，有必要繼續作进一步的探討。

商品，并不反映物品本身的自然屬性，而是这个物聯結着人与人之間的經濟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論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所說：“它（指生产品——引者）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和这个物品，和这个生产品聯結着的是两个人或两个公社間的关系，即生产者与消費者（他們在这里已不再結合在同一个人身上）間的关系。”因此我認為，探討这一問題，就是考察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关系是不是商品关系。

在我国现实經濟生活中，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关系是采取什么形式的呢？

首先，一个国营企业从另一个国营企业买得生产資料或一个国营企业将生产出来的生产資料賣給另一个国营企业，是根据国家的各級計劃来办事的。不是任意喜欢賣給誰就賣給誰，也不是你喜欢就可以任意买到。但是国家計劃往往只規定品种、数量。而詳細的規格、交貨日期、价格……等則由企业

双方通过訂貨合同确定下来，双方都須遵照合同办事。

其次，每个国营企业，都須独立进行核算，因而，采取买卖方式，要計价、轉賬。价格是由国家規定的，其中包括了企业的利潤率，企业不能随意变动价格和利潤率。企业只能用改善經營管理、降低成本、增产節約的办法来超額完成产值和利潤計劃。

再其次，买得生产資料的企业，只能使用它按照国家計劃的規定来进行生产。当它生产新的产品时，将生产資料的价值，以折旧費的形式，轉到新的产品上去。企业对于生产資料沒有随意处理权，非經上級机关批准，不得出賣或轉讓。經過上級机关批准出賣或轉讓的生产資料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照賬面进貨价減去已扣除的折旧額作价出賣；一种是无償轉讓給其他国营企业，原企业則作報銷处理。

国营企业相互之間对生产資料的交換，目前大致是采取上述这种形式和内容。当然，还有少量的生产資料（一般是計劃外的）和零件是通过市场在国营零售商店購买得来的，但这不是主要的部分。主要部分，不論是国家統配物資或計劃物資都是采取上述形式。这种交換关系是不是商品关系呢？对于这个同一的现实情况，所得的結論却不一致，而且可能刚刚相反。追溯其原因，是由于对商品和商品关系的概念各人的理解不同，因而得出不同的結論。因此，对于概念的爭論，并不仅是名詞之爭，而是联系到对现实問題的看法，从而联系到理論上的見解

有了分歧。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弄清概念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作为理论研究工作，更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商品、商品生产是许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而它又不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主的东西，它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特性，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还存在，而且还要发展，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也是一致的。问题在那里呢？在于商品既是许多种生产方式所共有，虽然它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有其不同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但是它也似乎应具有从各种具体社会性质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共性，也就是商品的最一般的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个社会形态的商品的一般概念，过去似乎是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们解决了，也不发生争论。但是当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还存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以往几种生产方式所存在的商品关系密切联系着的私有制基础已经消灭了。人们就试图找到能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包括在内的商品的最一般的共性。问题的发生就在这里。有些人把商品一般概念的框框定得大些，因而对于商品关系的范围就定得宽些，有些人的框框定得小些，对商品关系的范围就定得窄些。商品、商品生产有没有一般的共性呢？我认为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过去考察商品和商品生产，主要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来考察，并且一般是不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关系作背景来考察的。那么，是否应在经典作家所下的定义之外去找一个一般的定义呢？我以为不必要。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所以还会存在商品关系，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斑痕。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关系，虽然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但它大致地包括

在过去的商品关系的一般共性中。

有人对商品的一般概念下这样一个定义：“凡是能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都是商品”，或者是“凡是进入交换范围的产品就是商品。”根据这样的定义，商品的最一般的共性就是交换。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够全面。因为它没有表达出和这个生产产品联结着的两个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表达出这个交换的内容。因为交换关系不一定是商品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还是要相互交换其生产活动，但并不是商品交换关系。

我前在“论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一文中（见本刊1959年第四期），曾把商品的最一般的共性归纳为三点，即：“（一）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并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之中的产品；（二）这种交换联结着两个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三）这种交换是以同等价值的原则来进行的。”我到目前的认识，还是认为这样概括才较全面。但是当我们要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交换关系时，是不是认为必须完全地具有这些内容才是商品关系呢？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的个别特性与一般共性的关系应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应当历史地、辩证地来看问题。列宁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重点是引者加的）<sup>①</sup>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以往几种生产方式的商品关系的个别特性，也不可能完全地列入一般共性之中。在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是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性质的经济。它一方面保存着资本主义

<sup>①</sup>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3页。

遺留下來的殘余形式——這里包括商品、貨幣、價值的形式；一方面又生長了共產主義的因素。從整個發展過程來看，前者將逐漸趨于消亡，后者將日益茁壯長成。在這樣的錯綜複雜的過渡性質的社會主義經濟條件影響下，在生產關係起了根本性的變化的條件下，從資本主義殘存下來的商品關係，就不可能不帶着過渡的性質，不可能不起着局部的質的變化。因此，它就更不能完全地被列入一般之中，而只能大致地包括在一般之中。

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問題，就必然認為：國營企業相互之間的交換關係，由於它們是屬於同一個所有者，這種交換是在國家所有制內部之間的流通，是作為整體的全民所有制內部的兩個生產單位，實質上不發生所有權轉移，它已不存在私有制條件下的商品關係的最主要的特征，即：商品所有者對於商品有絕對的支配權，它可以將它出售給任何買主，而在商品出售之後，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對商品的所有權，而買主則變成商品的絕對的所有者，可以任意處置這些商品。從而得出結論說，國營企業相互之間的交換關係實質上不是商品關係。我自己過去也是從這一點出發得出同樣的結論。經過進一步考慮之後，覺得這一看法顯然不是歷史的、辯證的觀點。我在本刊第四期上的文章中認為，生產生產資料的國營企業把產品調撥給生產消費資料的國營企業，只是從一個生產過程轉到另一個生產過程，生產還沒有完結，只有在生產消費資料的國營企業利用這些生產資料制出了消費資料時，整個生產過程才算完結。對各個企業在生產過程上的獨立性沒有給予應有的估計，根據我現在的理解，有必要重新提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首先，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關係，因為生產者都是個別的私人生產者，產品是私人產品，商品聯結着的必然對商品有絕對支配權的兩個不同的生產者，商品經過交換

以後，絕對的所有權也就轉移了。而在消滅了私有制基礎的社會主義社會，交換關係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因此就不可能存在和私有制條件下一樣的完完全全的對商品有絕對的所有權和所有權轉移的交換關係。就是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之間的交換，國家與職工個人之間的交換也不完全具有這種特點。但從相對的意義上來看，各個國營企業又是相對獨立的生產單位。雖然生產消費品的國營企業的生產同生產生產資料的國營企業的生產有密切的銜接關係，但就生產過程來說，還是各自獨立的，它們之間的關係，仍然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就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之間而言，只要它們在生產上發生產品的調撥關係，它們也是相對獨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是通過交換來實現的。同時，從國家的整體來看，這種交換雖不存在所有權轉移的問題，但從兩個企業之間來看，它又有相對的所有權的轉移。交換之後，出賣的企業就不再具有權處理這些產品而買入的企業則有權使用它來進行生產。由此看來，這種交換聯結着的是兩個相對的不同的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即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這些生產資料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而且要通過交換來進入社會的消費之中。

其次，它們交換時要計算價格，雖然並不是在嚴格意義上的等價交換，但是一般地說來，國家在規定價格的時候，為了每個企業便于進行核算，是考慮到價值規律的作用，依照生產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勞動量來核定價格的。也就是利用價值的形式來計算。而生產消費品的企業，則將生產資料的價值轉化為它們生產的消費品的價值。這樣，是為了鼓勵和督促各個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節約勞動消耗量，使勞動的消耗低於社会必要勞動量，從而增加生產、降低成本，為國家創造更多的產品和更多的積累。因而各個企業就不能不關心本企業的成本核算，在交換中

就不能不有所計較，要求按等价原則来进行交換。从这个意义來說，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交換，仍然是根据等价原則来进行的。

由此看来，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生产資料的交換关系，是大致地包括于商品关系的一般特征中，就是說，它大致地具有商品关系的一般共性。因而，应当認為，国营企业相互之間的这种交換关系具有商品关系的性质，这种进入交換范围的生产資料就应当作商品来看待。由于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特点又使这种商品、商品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正如苏联政治經濟学教科书所闡述的：“当生产資料通过买卖从某一国营企业轉入另一国营企业时，所有者仍然不变，因为那些生产資料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改变的只是使用生产資料的企业；第二，生产資料在国营企业部門內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基本上是按照物資和技术供应計劃，这是与消费品不同的，消费品是自由买卖的对象；第三，国营企业——工厂、矿井、电站及其固定生产基金（生产工具、厂房、营造物等等）——不能买卖，只能根据上級国家机关的决定，而由一个国家机关交給另一个国家机关。”<sup>①</sup>

国营企业部門內部之間的商品关系，除了由于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之外，同时也由于国家所有制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相互关系的特点形成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

經濟是一个統一的整体，各个所有制形式之間，各个生产部門之間，各个企业之間，彼此互相联系、互相依賴和互相影响。既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間、国家与职工个人之間存在着广泛的商品經濟关系，就不能不影响到和它們相互联系的国营企业部門內部之間的关系，需采取同其他經濟关系相适应的最便利的形式。例如国营企业内部之間的交換采用了价值、貨幣形式，各个国营企业的核算也利用了价值形式来計算，国家的积累也利用利潤的形式来表现等等。然而，这些都不是决定国营企业内部之間必須存在商品关系的內在的因素。如果单从这些外部的影响来看，有些同志認為国营企业内部之間的交換只存在商品关系的形式，商品的外壳，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在于更本质的是由于国家所有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国营企业内部之間必須存在商品关系，因而就不能說这种商品关系只是形式而无內容。

承認国营企业内部之間的商品关系，对于更好地認識价值规律的作用，自觉地掌握它运用它为社会主义經濟有积极的意义。但我这个意见是否正确，还有待于繼續从实际經濟生活去考察，进一步去分析和研究。

① 苏联“政治經濟学教科书”第三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1頁。

## 广州市高中历史教师座談开展历史科学研究問題

广东史学会、广州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学研究會及理論与实践編輯部于四月十八日下午联合举行广州市中等学校高中历史教师座談会，討論关于中学教师如何参加历史科学研究問題，并邀請曾赴北京参加关于編写“中国通史”座談会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金应熙同志介紹“座談会”情况及討論問題。会上，就中学教师参加学术研究工作，进一步繁荣广州地区的学术研究問題广泛地交換了意見。



# 論

## 試論中国封建时代历史的分期

关履权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虽然经过史学界的讨论，但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我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说明什么是分期的标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凡·丹·帕述舵、爱尔·凡·車列卜林等在“论封建时代俄国历史的分期”一文中这样说：“历史家于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划分历史时期时，应该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上来观察这类变化的表现，且以此为分期的基础。阶级斗争，特别是它的较高形式（起义），在历史过程分期上，乃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标志。”<sup>①</sup>他们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时期的标准，其实就是结合了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观察的。因为阶级斗争的高涨和它的爆发，系反映着整个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家于划定某种矛盾的社会形态内的历史分期时，应该从阶级斗争展开与发展的观点出发，把它看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上相应进步的指标，把它看作基础及适合着它的上层建筑之发展的指标。但是，阶级斗争只是在它的阶段和发展形式与作为历史过程之基础的生产方式之发展血肉相联时，始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sup>②</sup>所以，在确立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划分标准时，也应以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结合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作为根据。

按照上述标准，我认为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期，即：

第一，从战国时期到黄巾起义（公元前475年——公元184年）是封建社会的早期。

第二，从黄巾起义后到黄巢起义（公元184年——884年）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期。

第三，从黄巢起义后到元末红巾起义（公元884年——1368年）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期。

第四，从元末红巾起义后到鸦片战争前（公元1368年——1840年）是封建社会的晚期。

### 一、封建社会早期（公元前475年——公元184年）。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瓦解以后，我国即同时并存着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由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的结果促进了农村公社的解体和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秦汉二代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原来公社成员对公社的贡纳，转化集中为对皇帝的租税负担，形成了农民对国家的隶属关系。因而，封建统治者主要的剥削对象是农村中比重较大的个体农民，这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历史的一个特点。汉武帝以后，土地兼并和奴隶买卖的情形日趋严重，自耕农民日益破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或沦为债务奴隶，这说明了：“封建主义的主要经济矛盾是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和大封建所

<sup>①</sup>石父輯譯：“苏联历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华书局1954年4月4版第28頁。

<sup>②</sup>同上书，第29—30頁。

有制之間的矛盾。”<sup>①</sup> 面对着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統治者为了緩和矛盾的发展，虽然考虑过限制豪强地主的兼并，提出所謂限民名田、限奴婢、以及立井田之制的主张，但是土地兼并的严重問題仍不可能得到解决，因而爆发了东汉末年最大規模的黃巾大起义。

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是在奴隶制度发展不充分的历史条件下，从公社残余过渡到封建制度的形成。因此，在封建制形成之初，奴隶制的残余比較浓厚。这种特点在我国早期的封建社会中表现得最显著。在这一时期中，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已經确立，封建經濟制度已經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奴隶制的残余还很浓厚，不但在手工业和商业中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在农业中也有少数的奴隶劳动，而部分大工商家就是奴隶制残余經濟力量的代表。奴隶制残余跟封建制自然是有矛盾的。秦汉时代所实行的保护农民、打击奴隶主工商业家的政策，就是业已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压抑奴隶制残余的表现。

战国秦汉时期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商品經濟带有早期的、不很成熟的色彩。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一些富商大賈拥有大量奴隶从事工商业活动。手工业和商业迅速的兴起和迅速的衰落，工商业相当高度而集中的发展。自然經濟占绝对优势的农村包围着少数发展起来的大城市，商品貨幣关系是以自給自足的农业經濟为基础的，商品經濟并不能普遍深入。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现代史，这是城市关系滲进乡村，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乡村关系滲进城市。”<sup>②</sup> 这些跟我国封建社会以后的几个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情况相比較显然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賦役制度虽然有租有賦，但是以劳役地租为主要形态，代表力役的“賦”重于按田計征实物的“租”。汉代虽然減輕田租，但賦仍然很重。封建社会形态既具有經濟强制，又具有超經濟强制。

劳役地租的比重愈大，則超經濟强制愈厉害，这是符合封建社会早期历史发展的规律的。

早期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表现出很大的原始性。首先是宗教色彩浓厚。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吳广领导的起义以“魚腹丹书”、“篝火狐鳴”等作为发动起义的手段。东汉末以张角兄弟为首的农民起义，也是以“五斗米道”为組織群众的主要手段。因为限于階級社会条件，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虽然大都利用宗教作为鼓动和組織群众掩护革命的工具，但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起义，单纯依靠宗教，利用宗教号召群众的迷信色彩較浓，还不能提出較为明确的政治口号，这是它的特点之一。其次，早期封建社会的农民还不了解封建国家首脑——皇帝的存在对全体劳动群众的压制剝削关系。他們反对封建奴役，却往往拥护“好皇帝”。这种情况在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是比較突出的。例如陈胜、吳广起义提出扶苏的名字“为天下唱”<sup>③</sup>，西汉末农民起义軍的拥立刘玄、刘盆子为皇帝，銅馬起义軍的归附刘秀等都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再次，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斗争經驗跟以后的时期比較还不够成熟，在作战过程中，彼此联系不够密切，力量分散，易于給敌人逐个击破。如陈胜、吳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西汉末綠林、赤眉农民起义，东汉末黃巾起义等等都不同程度的暴露了这些缺点，这些缺点之所以产生，只有从封建社会早期，自然經濟占绝对統治地位，封建的割据性、分散性比較浓厚等社会經濟情况中，才能找到其必然性的理解。

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反映出我国早期封

① 苏联“历史問題”編輯部：“論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經濟規律”討論总结，“史学譯丛”1955年第五期94頁。

② “資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版第15頁。

③ “史記”：“陈涉世家”。

建社会经济的特点，是以自由的自耕农民和封建依附农民为主体并有奴隶参加的反对封建依附和奴隶化的阶级斗争。这充分地说明了农民反封建压迫的自发性，但都严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迫使统治者在赋役方面作了让步，在一定程度上和缓了自耕农民的分化和满足农民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建立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思想界便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从各方面代表着各自的阶级利益，反映出当时社会在历史大变革中尖锐的阶级斗争。从秦到汉，随着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的出现，秦以儒法合一的思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西汉时期更产生了董仲舒的地主阶级政治哲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一尊，孔学与皇权相结合了。儒家思想的被确定为统治思想正好与早期社会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相适应。跟这种统治思想相对立的是王充的政治思想和唯物论的哲学思想，这两种思想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

## 二、封建社会成长期(公元184年—884年)

经过黄巾起义对东汉末年的豪强地主的严重打击，中断了大土地所有制的恶性发展，使三国、西晋时期的封建统治者有条件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如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其后北魏和隋唐更进一步的实行了均田，从曹魏的屯田到唐代的均田，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其中的发展过程：一步步的系统化和严密化。这些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国家把一部分土地分配给小农去耕种，向国家交纳户调、田租，一方面和缓了东汉以来大土地占有和生产的个体性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拿法律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剩余产品结合起来，把大量自由小农转化为国家直接

控制的农民，加强农民对土地的附着和对国家的封建隶属，这说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国家不仅是最高的地主，同时也是直接的地主。也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国家土地所有制从早期封建社会转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地主田庄也发展起来，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了两汉时期。农民对豪强地主的依附关系如部曲(农奴)和荫附(半农奴)，部曲和荫户身份很低，近似奴隶。这些大地主田庄在北方发展成为半独立的经济军事组织，在南方成为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唐代工商业的发展比较早期封建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例如城市手工业作坊的产生和发展，金属货币使用的比较普遍，“短番匠”“和雇匠”，以及唐后期的“飞钱”和“柜坊”的出现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现象。

这时期的赋役形态改变了以前的田租、口赋、算赋，而以租调(即户调、唐为租庸调)为主。农民的实物负担逐渐加重，实物地租比之前一时期愈来愈重要了。唐中叶后由于农民的逃亡，土地的兼并，均田制逐渐破坏，两税法起而代替租庸调，但两税法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剥削的新办法，人民仍有“倍输”、“三输”之苦，并没有解决社会矛盾，最后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转向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比较早期封建社会更加剧烈，组织规模更大，斗争经验也逐步丰富起来。例如隋末农民战争地区的扩大，并且在斗争过程中懂得了联合的重要，逐步从分散的状态进到局部集中的状态。唐末农民战争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流动战，打击敌人，壮大了自己。

无论隋末或唐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都严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隋末农民战争迫使唐初统治者不得不在徭役征发上作

了重大的社步，庸的出现表明劳役逐渐向实物形式的转化，农民的身份提高了。唐末农民战争横扫南北各地，使各地的門閥世族地主势力一扫而光，从此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因而开始了五代至宋元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各族人民在共同联合一致的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和接触中，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促使彼此之间的大融合。北魏孝文帝改制的成功，正标志着当时汉族和各族人民之间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各族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帝国更加强了内地和边疆地区的联系，进一步推动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随着早期的封建社会向成长期的发展，阶级矛盾日趋复杂。魏晋玄学是农民革命低潮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农民的思想工具。在魏晋的玄学中虽然也有意见分歧，但那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论。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道思想的盛行，以至于唐后期所产生的道学思想。道学是以儒家观点排除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形式，但在实际上汲取了佛道二教的思想内容，成为新的烦琐哲学。这是門閥世族势力衰落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加强在思想上的反映。在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以范缜、傅奕、吕才、刘禹锡等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非身份性的地主阶级）反門閥世族地主（身份性的地主阶级）的斗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地主的斗争。

总的来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思想的发展仍然以儒家封建的伦理观念作基础，表面上通过名、法、道、佛各种样式的玄虚抽象的理论或宗教迷信作为麻醉人民的工具。是我国封建社会成长期中封建地主阶级进一步控制人民加强统治的反映。

### 三、封建社会发展期（公元 884 年——1368 年）

由于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起了变化。庄田制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在这一时期，仍然通过“官田”形式直接控制一部分土地和农民。但从当时情况来看，“官田”是通过租佃关系佃与那些没有耕地或耕地不足的贫农来耕种的。耕种这些“官田”的佃农，每年按耕地面积的大小向政府缴纳重租，和地主将他的耕地佃给贫农而坐收租课一样。即所谓：“公田之赋，凡官庄、屯田、营田等赋；民耕而收其租者也。”<sup>①</sup> 这时期的地主庄田也大大发展起来，在地主田庄上的直接生产者佃农，他们对地主土地的使用，有了契约的关系，主客租佃之制成为农村的普遍形态<sup>②</sup>，租佃制有了发展。

“宋会要”记载地主阶级“添租割佃”的史实很多，说明佃农对地主土地的使用是有了租约的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大地区的佃农起移，可以“不取主人凭由”，“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如“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州县论详。”<sup>③</sup> 这些情况说明了生产者地位的变化，对封建国家的隶属性和对地主和土地依附关系都削弱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能起推动作用。这是自然经济的统治逐步减轻，商品经济的成份逐渐加强的反映，也就是封建社会发展期的一个特点。

从五代到两宋，手工业和商业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手工业作坊种类的完备和分工较细，国内外市场

① “宋史”：“食货志”。

② 洪迈：“容斋续笔”卷7载主客分租之制。王之道：“王相山文集”卷22，“乞止取佃客笏子条”载有租佃契券。

③ “宋会要稿”：“食货”一之二四。

的扩大，货币流通量增加，并且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五代十国”期间，黄河流域继续受着战争的破坏；北方边境又为契丹统治者侵占，广大人民颠沛流离，中原沃土变成了贫瘠荒蕪的地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诸封建王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和安定社会的政策，使南方的经济文化仍能继续向上发展。两宋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重建，构成我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时代，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时代。

由于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土地占有关系起了相对的变化，地租形态也就跟着发生了转变。这一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已从封建社会成长期的军事、政治统治形式为主逐步转而为以经济统治形式为主（军事屯田除外）。地租形态也与前期有别，就是以实物地租为主，配合着屯田制度的劳役地租形态。

这一时期中有很长时间和较大地区淪陷于外族统治之下，如五代的契丹、北宋的辽、南宋的金及蒙古。在这一时期中，是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相结合的更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惨苦，因而激起了连续不断起伏不已的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与此同时，南方人民与逃亡到南方来的北方劳动人民，共同发展生产，使南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比前两个时期更加明显的面向着以专制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以比较明确的政治口号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北宋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北宋末方腊领导的起义提出“平等”的口号，南宋初钟相、杨么领导的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口号，并且有推行这一口号的政治主张，农民革命从以前的要求身份解放的号召，进到了平均所有的号召。说明了这

一时期农民战争的丰富政治内容，革命目标的逐步明确，强烈地反映了农民群众坚决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希望摆脱封建制度的奴役的革命愿望和要求，显然比我国封建社会早期和成长期的农民战争有了很大的进步。

从五代到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发展。元末红巾起义是元朝统治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长期交织发展的结果，因之元末农民战争是划分封建社会发展期与晚期的重要界标。因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长期交织发展的结果，产生了儒、道、佛合流的理学。它是唐后期道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宋元时期统治阶级加强和巩固封建制度的工具。十四世纪的元朝更规定朱熹为孔子的正统继承者，朱熹的哲学成为正统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也出现了有商人意识的哲学家如叶适、陈亮等，他们反对当时的道学家只谈经院式的烦琐的哲学问题，要求哲学注意于实际的政治与社会上的问题，提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事功之学，反映了封建社会发展期中商品经济的活跃。这些学者先后遭受了豪族地主势力的迫害，又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斗争的复杂化与激化。

#### 四、封建社会晚期(公元1368年—1840年)

元末红巾起义推翻元政权，结束了蒙古贵族在中国的残暴统治，迫使明初统治者实行恢复农业生产和平均赋税徭役的措施，推动封建社会向最高阶段的发展，说明了元末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明清统治者将国家政权完全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形成了高度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这种封建专制的加强和政治压迫的残酷，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封建统治者的胆怯。

明初统治者确立了百官禄米之制，改禄田为禄米，其后又由禄米转变为一部分用银

鈔(貨幣)的俸給<sup>①</sup>。清代也同樣取消了祿田。祿田的取消相對地加強了這一時期政府直接控制的官田的管理，也反映了封建社會晚期中央集權的加強與貨幣流通的發達。

明清時期的賦役形態是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農民對賦役的負擔是實物負擔逐漸減少，貨幣負擔逐漸增加，最後則全變為貨幣負擔。

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商品經濟比前幾個時期都有了更大的發展：在絲織業、瓷器製造業等部門里出現了手工工場，有些城市成為專門手工業的中心。國內各地的經濟聯繫日益加強，資本主義生產開始萌芽了。

由明代“一條鞭法”開其端直至清代的攤丁入畝，由農民親自供役代而通過貨幣方式來聯繫，使農民比較前一時期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比較容易離開土地，這就給城市手工業提供了更多的勞動力來源。由於折收銀兩，農民對封建王朝所負擔的賦稅和徭役基本上貨幣化了，同時地主對銀兩的要求更來得迫切，加深了對農民的剝削，並加速了農產品的商品化。

這一時期地主階級對農民剝削更加殘酷與嚴重，土地高度集中，其嚴重程度超過了以前幾個時期。國家控制著大量莊田和皇莊，一般的地主也瘋狂地掠奪人民的土地，大土地所有制高度發展。

從封建社會發展期開始的封建的契約租佃關係，在明清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現象在東南沿海地區更為突出。佃農所受的剝削雖然沉重，但在契約上書明可以改佃下伙，不能阻占，契約規定的期限滿後，便可以離開地主的田莊。在一定的條件下，未滿期也可以離開。封建社會晚期的階級矛盾更趨尖銳與複雜，主要表現在農民戰爭規模的宏大、組織的嚴密、鬥爭經驗的豐富、革命的目的性也愈來愈明確。而且這時期的農民起義由於有手工業工人的積極參加，揭示

了較鮮明的反封建的旗幟，如明中期的農民起義和明末的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都反映了這一特點。明末農民起義是我國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侵入前最後一次空前大規模的起義。這次起義群眾基礎的廣泛，軍隊紀律的嚴明和政治口號的鮮明，是以前各個時期的農民起義所沒有的。特別是符合當時城鄉人民要求的“均田免賦”口號和政策的提出，這些口號和政策反映了由發展期中農民戰爭的“等貴賤、均貧富”進一步明確地提出對土地的要求，完全針對了明末的腐朽政權。又當殘暴而腐朽的明王朝被農民革命推翻了以後到清軍進關時，革命形勢轉變，農民軍的鬥爭又能及時的以反階級壓迫的鬥爭轉而為反民族奴役的鬥爭。

市民反封建壓迫的鬥爭的開始出現也是封建社會晚期階級鬥爭的特點。

在思想方面，封建地主階級繼續利用理學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明成祖永樂十三年命胡廣等編成“性理大全”，清康熙命李光地等在“性理大全”的基礎上編成“性理精義”。肯定程朱為正統，列陸王為雜統。提倡代聖人立言，發展了宋元理學中的反動因素，以加強精神統治，這是封建社會晚期封建專制統治日趨反動的反映。

明末清初之際，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想家和愛國主義者如方以智、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顏元等，他們在封建社會晚期反動統治的苦難中憧憬著新的世界，在哲學領域中，他們基本上是站在唯物主義立場跟空談性理的唯心主義正統道學展開了鬥爭。這種啟蒙思想的產生正是封建社會晚期社會矛盾尖銳化和複雜化以及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等情況的反映。

以上所述，希望得到指正和批評。

<sup>①</sup>參考“大明會典”卷39“官俸條”。

## 「五四」运动在广东

胡希明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点起了星星之火后，接着以燎原之势，点燃了全国爱国人民的心头怒燄。在国内各地首先起来响应的是青年学生。他们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帝和反媚日卖国的运动，进行如火如荼的斗争。

五月十九日，北京学联，为抗议北京政府的反动措施，宣布中等以上学校罢课，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学生，纷纷响应。五月廿六

日，广州中等以上学校，也采取罢课行动。

## 广州学生起来了！

在“五四”运动之前，1918年6月5日，广东便成立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发出了宣言书。

宣言书说：“奔启者：中日密约，中外哀传，亡国丧家，祸迫眉睫。吾僑学生，受国家之培育，为社会之中坚，对此亡国丧家之密约，其将俛首帖耳，怵怵俛俛，而莫敢抗争耶？抑将磨拳擦掌，汹汹涌涌，群起而骚动耶？前者，颓唐老大，麻木不仁，谓之无耻，谓之制造粪料之机械，直不能名之曰人。后者激于一时之客气，张脉偃兴，亦能振励，然外强中干，十五分钟后又相忘于无事，依旧酣嬉矣。嗚呼，如是之国民，如是之学生，国焉得而不弱，焉得而不亡耶！……而最近如(民)四年廿四条条件之要求，日人既满囊呼啸而去，又上吾

国以蠢猪之称号，其轻恣狂暴之态，国人非恨之刺骨而思与之拼命者耶？曾几何时，今又有密约之发见，国人其奈之何哉？即其奴隶我，牛马我，若彼之待高丽者以待我，国人又奈之何哉？要之我国人苟无真实的自觉心，坚固的团结力，祇十五分钟之热度，如一盆散沙焉，其必不能御外侮而反招外侮，必不能救国亡而反促国亡，盖征于前事而可断者也。吾僑学生，非所谓受国家之培育，为社会之中坚者乎？苟尚无真实的自觉心，坚固的团结力，亦只有十五分钟之热度如一盆散沙焉，又何责乎国人也？是吾国之弱且亡，实为我学生之罪，我学生其能任之乎？此所以有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之组织也。斯会之组织，固以争此次密约为动机，然其究竟之目的，不贵有一时奋兴之客气，而贵有永久不灭之决心，沉潜修养，实事求是，振爱国之精神，导国人以自觉，斯所愿也，庶寡过乎。但念任重道远，非独力所能胜；是用嗷血嚶鸣，期众擎之易举。素仰贵校热诚爱国，必表同情，前月三十日，各校代表公订于本月五日一时，开成立大会，假座东园，届时务恳派代表三人赴会，讨论一切。如有惠教邮寄高等师范，便能拜收。临楮不胜屏营之至。”

另外，省学联又发表了“致各县中学校书，内称：

“某某中学校并转各县中学校全体学生诸君鉴：云山迢递，瞻仰为劳，风雨鸡鸣，深滋结想；比维学与时增，祖鞭猛着，下风迷听，无任欢驰。邇者国步多艰，飘摇风雨，东邻虎视，密约惊传，瞻望前途，忧心如撻。敝同人每念亭林匹夫有责之言，信国所学何事之语，未尝不惕然振励，思挽危亡。窃谓吾辈学生，处千钧一发之秋，忧国破家亡之惨，有不可不亟为兴起，策励进行者数事，敢为诸君子陈之：夫国之危弱，缘非一端，而国民之昧于国情，铜蔽顽塞，致召外侮，固可信者。我辈欲去其弊，不可不实行通俗演讲，以唤醒同群救国之精神，一也。至我国社会，生计困难，贫家子弟，无力就学，民愚国弱，可为寒心。我辈欲补其缺，不可不筹设平民学校以灌输社会生活之知识，二也。近年以来，洋货输入，国货滞销，利权外溢，难以数计。民生凋敝，国本动摇。我辈欲除其害，不可不提倡国货，以杜绝贸易之漏卮，三也。凡此诸端，皆救国之本图，吾辈学生所不可不亟为策行者也。敝同人有见于此，用集省会公私各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积极从事，举凡贫民义学，通俗演讲，

职工教育，旬报月报等，次第举行。数月以来，奔走駑汗，竭其綿薄，不敢告劳。惟是地方辽阔，普及之力，愧有未周，素仰諸君子热心公益，爱国为怀，尙望对于一切进行，勳其不逮；尤望邀同邻县中学，組合坚固之团体；俾与敝会联络，一致救国。从茲宗旨坚持，努力黽勉；行见晨钟暮鼓，觉世牖民，国家前途，庶有豸乎！临穎神馳，不胜禱切。耑此，并頌学安。八月廿五日”

省学联成立后，关于工作的决定，是：“通电反对中日密約”举行社会运动以唤起人心，与京滬学生救国团体相提携，并与留日学生广东同乡会学生救亡团向国会請愿反对密約，宣布其无效……接着又議决：設立平民义学，組織演講团并定講題为：甲，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乙，吾国今日之位置。丙，国人应有之自觉心。丁，世界之趋势。……由上述各文件看来，广东学生在五四运动前，其活动的方向，还是局限于爱国主义及改良主义的范畴的，虽然有些人已經認为“李大釗先生且謂今日世界之趋势，为 Bolshevism 之胜利。社会革命之活剧，其将自此开幕乎！”（摘自該会会刊第一期）

到了“五四”的烽火燃起后，广州学生又組織了广东省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这个会是与“省学联”对立的。如“省学联”当时不主张罢課，而省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却主张罢課，并主张联合工商界进而罢工罢市。这个会派出代表到上海与全国学联联系，并且領導了广州市学联，組織了波濤广阔的爱国运动。

当时，广东督軍是桂系軍閥莫荣新，省长是翟汪，警察厅长是魏邦平，他們和其他各地的反动統治者，是一鼻孔出气的。指学生是“匪徒”指爱国行动为“扰乱治安，”而且公开表示要“尽法懲办。”

尽管如此，义憤填胸的广州学生，并没有被反动淫威所吓倒。五月卅日，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及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在东堤东园，召开了大会。在开会时，突逢滂沱大雨。但与会者沒有一人离开会场，登台演講的学生，声泪俱下地慷慨陈詞，竦立听讲的群众們，吞声暗泣地表示共鳴。大会决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队伍，約在千人以上。队伍向长堤方面进发，目标是到长堤先施公司、西堤大新公司及十八甫真光公司。当到达先施公司門前，大家高呼：“抵制日貨，打倒三大亡国公司”，即在此时，从楼上发出了枪声。部分学生，应声登楼。慕藜英文专科学校有一个曾从肉行拳师学过拳

脚的学生陆友三，一拳把凶手的手枪击落，群众把他拉到楼下，經過詢問，这凶手是先施公司經理馬应标的亲信馬德耀，群众在他身上贴了“亡国奴馬德耀”的字条，使他站在椅子上，面向成千成万的人認罪。

此时，长堤东西两端，来了許多全副武装的警察，一面包围游行队伍，一面强搶开枪凶手。它們举起实弹的步枪，上着刺刀，威胁着赤手空拳的学生，并且恣意毆打，許多学生被刺刀刺伤，鮮血染紅了衣衫。但学生們仍然挺身而斗。有一位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还徒手夺得一支步枪。經過一个時間的斗争，学生們为了急救重伤同学，放弃了凶手，把伤者抬进先施公司的貨柜上敷药。却沒料到奸商关鎖了門外的鉄柵，以致有三百余名学生被困柵內。

被困的学生，临时举行全体會議；推选一部学生，組成糾察大队，負責护理受伤同学，并保管該公司的貨物以免事后被誣。另外，各学校推选代表，指揮本校同学的行动，秩序井然不紊，还唱英武不屈的歌曲和高呼口号，贏得了柵外群众的同情和贊叹，許多学生和市民，送茶水食物慰劳，喊着“努力掙扎”“設法营救”的口号，直到次日的黎明。

曙色方开，大队警察从楼上俯衝而下，拿着木棍和竹帚、火什什地向被困者迎面打来，又經過一场搏斗，結果是彻夜无眠、疲劳过度的学生被打败了，有七名学生被捕，其余学生，几乎每人都負了伤，被警察逐出門外。

就在五月卅一日，广东的反动統治者，由广东督軍莫荣新、广东省长翟汪出名，张贴了一张无耻的布告。布告声称：“断不容此等乱民扰乱秩序。”

翟汪还秉承受駐广州日本总領事官太田喜平的意旨，以“风聞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問題，遂欲抵制日貨，并运动排日”为詞，要学生在修业时期，“自当专心学业，各能养成健全国民之人格，即为学生爱国之方，至政治問題，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还规定：“嗣后各学生無論在校內校外，均須穿着制服，随佩帽章領章，以符定章，而資識別”。

莫荣新的鷹犬警察厅长魏邦平也出了布告，声称“如敢故违，一經拿获，即以扰乱治安論，尽法懲办不貸”。

这三张布告，引起学生的更大的憤怒和群众更



多的同情。学联会听取了被困学生的报告之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六月一日）举行扩大示威游行，小学生们也参加在内，浩浩荡荡的队伍，准备向莫荣新“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同学，交出凶手并惩办魏邦平。另外分别与工商界联络，以罢工、罢市，作为对爱国学生的后盾。通过那次庄严整齐的游行，得到各方面的支援。许多工人，都热烈表示要同学生们并肩作战，以罢工响应罢课。部分有爱国思想的商人也准备罢市。

在群众的压力下，反动统治者不得不允许教育会长陈其瑗（现任内政部副部长）保释学生出狱。但紧接着是各校当局把在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开除学籍。并由翟汪公布“……本年六月十六日起至七月廿五日止，为暑假休业之期……”借以分散学生的力量。“学潮”不再扩大了。但广州学生的壮举，对各中小城市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广州学生们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宣传，扩大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

### 运动的重点——潮梅

当“五四运动”的大风暴，吹到南方海岸线潮汕一带时，在汕头出版的公言报，把全国各地的运动情况，不断地作了报导，而且发表了一些有关运动的短评，对粤东一带读者，起了一定的鼓动作用。这个报是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创办人大埔侨商张弼士的私营企业，反动当局对该报有些顾忌，没有横加干涉。同时，宣称执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粤军，正驻军福建漳州，与潮汕近在比邻，随时作回粤的部署。在潮汕地区经常地进行秘密活动。对当时桂系军阀陈炯明——先后任潮汕镇守使的莫擎宇、刘志陆有很大威胁，因此，潮汕一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较广东其他各地为活跃，虽然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在汕头有很大势力，军事上驻有水上警察，经济上开设台湾银行。但爱国群众，迄无畏惧。

五月六日，公言报发行的“号外”送到潮州城。金山中学和韩山师范的学生，立即组织大规模的“五七”国耻纪念会并筹备“示威游行”，游行那天的中午，“金中”、“韩师”、潮安第一高小，城南小学，茶阳旅潮小学及教会办的小学等各校学生约二千人，在西门火车站广场集合，学生们举着自己的校旗和写着“誓死不承认廿一条亡国条约”“打倒北京卖国贼”“抵制劣货”……的白布旗。由

西门进城游行。学生们沿途高唱“从军乐”的军歌，行列井然。另组有五人或七人的劣货检查队，随同大队进行，到了城内大街，检查队进入洋货店检查日货，凡标志日本制造的货物，一律收集起来，加以击毁或焚毁。商店主固然不敢反抗，旁观者也拍掌称快。尤其在下午三四时，突落大雨，参加游行的男女学生，依然保持秩序。巩固阵容，这表现给市民们以很好的印象。

游行之后，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各校学生，在校内检查日货，凡日货物品，亦加以击毁或焚毁。并利用晚饭后及自修时间，分别结成小队，到街头上宣传演讲。启发了一般人民的爱国思想。

接着，潮梅各县的学生会，陆续组成。除了宣传爱国运动之外，还结合反迷信、反神权、反妇女缠足，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等反封建运动。

领导潮梅各县学生会的总机构——“岭东学生联合会”也在这时成立了。这个会的重要组织者及领导者是杨石魂烈士，方临川烈士和方思琼（即方方同志）伍治之同志等。他们组织了汕头学生的游行示威，在总商会门前把查获的日货付之一炬，同时捣毁了汕头警察局，对素与日本驻汕总领事勾结的警察局长李少如作了严重的警告。那些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快的与农民结合起来，他们后来大多数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有些成为共产主义的光荣战士。

潮梅区的梅县，在五四运动时是全广东学校最多的县份，超过了以前“文风冠全省”的文昌县。中等学校，有民办东山中学，省立梅州中学，县立中学，女师、丙镇、松江、畚江、梅北、南口……等中学和德国教会办的乐育中学，美国教会办的广益中学。每校学生，至少在三百人以上。小学则在百余间以上。

当汕头出版的公言报和平报把“五四运动”的情况，报导给梅县读者群众之后，以东山中学、梅州中学的学生界，随即展开了活动。各校学生，分别集会游行，上演“亡国恨”之类的白话剧。学生联合会成立后，又组织了检查仇货队，在各洋货店检查过几次日货。查出后把货品集中到东校场焚毁。最激烈的一次，是对井头街务本公司的斗争。那间务本公司，是当时梅城最大的百货店，由绅士黄默村、吴登初等投资组成。经理店务的吴紫峰凭借绅

士关系交通官府，武断乡曲，拒絕学生的检查，学生们在愤怒中击碎该店的橱窗，作为对封建紳商的严重抗議。这些义举，得到人民的同情，包括有正义感的商人及地方头面人物在內，也即因此。当时任县知事的湖南人瞿崇文，只得佯作痴聋，不敢橫加干預。外国教会办的学校，也只得听任学生不上圣经課，不做礼拜，而去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与梅县相邻的大埔，县立第一中学組織的“埔中白話剧团”，在各乡村演出了爱国主义的話剧，如以火烧赵家楼为主题的“打曹章”；以检查日貨为主题的“捉奸商”“烧劣貨”等活报剧，还編演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剧，如“烧孔庙”“反迷信”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剧如“亡国恨”“安重根”；等，都得到許多观众的欢迎。那时，汕头的公言报，由大埔人张秩卿主持，平报由大埔人蓝逸川，林諤庵，錢热儲主持。这两个报除了供給各县以話剧稿本外，还代为募捐款項，支援演出，林諤庵，錢热儲还亲身参加話剧团的編导工作，加强了这一宣传武器的效果。

梅县北邻的兴宁，在当时也和銷售日貨的奸商，进行剧烈的斗争，有一个綽号刘霸同的商店店主，拒絕学生检查，并从楼上抛擲瓦器，击伤了一些学生，且鳴枪示威，但学生依然冲进店內，把刘霸同拉出来当众謝罪，还把刘所藏的大批日本洋紗及其他日貨，搬到城外草坪上全部当众焚毀，通过这次斗争，表现了爱国青年的威力，使人們对学生敢于和恶霸奸商斗争的精神，表示快意及欽佩，为以后的兴宁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以梅县为中心說“客家話”的其他各县，大致与大埔、兴宁相同，全体中小學生，几乎都卷入到运动的浪潮里，“新青年”之类鼓吹进步的专刊，在运动中深入到知識分子当中，在粵东一带，播下新文化运动的种子。

### 热浪卷到了西江南海

五月卅一日，莫荣新、翟汪以督軍省长名义，会銜发出急电，原电称：

“急。广惠鎮守使，粵海张道尹，肇庆古鎮守使，汕头刘鎮守使，李道尹，高州陈鎮守使，朱道尹，欽市馮督办、陆道尹，廉州鎮署，琼州黃鎮守使，黃道尹，韶州李督办，杨道尹，惠州刘总办均覽：近因青島問題发生，全国憤激。日来省城各学

校男女学生列队巡行于市，提倡抵制日貨，热忱爱国，举动本极文明。乃有不法棍徒，竟至借端糾众，夺掠毀物，扰乱商民，实属荒謬已极。除严飭軍警認真彈压查禁外，誠恐此风传播，人民易滋誤会，相率效尤，应由各地文武預为防范，如有此等扰乱举动，应即派队彈压，严加禁止，毋任滋事，以維治安。并由各鎮道轉飭各县，一体遵照。”

这急电下达各处之后，那些反动統治者的帮凶，特别是手握軍权的鎮守使，自然奉命唯謹，准备对爱国群众进行残暴的鎮压，但是誰也阻止不了时代的进步。由珠江三角洲騰起的爱国运动的热浪，很快地逆流而上，进入西江的肇庆城。

肇庆，是粵、桂之間的名城，扼广州与梧州水上交通咽喉。那里的活动，不仅影响西江各县而且影响着广西的东部各县。当时，以省立肇庆中学为首的各中等学校，高要县立中学，广东甲种农业学校，省立肇庆师范学校和高要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都組成了学生会，并派出宣传队在城乡各处宣传，宣传員痛哭流涕地描述中国的危机和印度、朝鮮亡国后的惨况，悲憤激昂地斥責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最初，围听的群众是出于好奇，听下去却受了感染，因此，宣传队的歌声，便成为召集群众的号角。

接着，包括五間中学和十余間小学的肇庆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学生的陣容更加壮大。全城学生，曾举行过一次示威大游行，还举行过一次提灯大会，宣传队不只采用一般理論宣传，还进而联系实际，和向听众作問答式的启发，例如宣传員問：“老伯你觉得现在的日子好过还是从前好过？”听众答“不如从前！”进而双方在問答中作了过去和现在的比較，再进而由宣传員指出日子不好过是日本和卖国政府所造成的实况。通过这种宣传方式，加强了群众对时局的認識，对运动的同情，收到了較大的宣传效果。学生们于“悦城龙母誕”的庙会时，到德庆县作了扩大的宣传，对五、六万“进香拜佛”的群众，作了几天宣传工作，影响更大。同时，学生们組織了检查和抵制日貨的队伍，派糾察队登記各商店的日貨，只准卖出，不准买入，这办法也为商人們所拥护。

为着分散学生力量，翟汪以省长名义，宣布提前放暑假，各校校长，也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耻手腕，把在运动中起較大作用的学生，开除学籍，但学生们却利用暑假，回乡繼續宣

传，并和各县学生联系，成立了一个比肇庆学联更庞大的机构，包括罗定、云浮、郁南、阳春……等县学生的“肇、罗、阳学生联合会”。这又给予顽固派以更重的打击，例如最顽固的“肇中”校长陈德彬，平日狐假虎威地镇压学生，在此时也灰溜溜地辞职离校了。

这一运动的青年领导者及骨干分子，后来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光荣的共产党，而且为党的事业壮烈牺牲。如当时甲种农校的陈殿邦（1928年在广州就义）肇庆中学的程永钧、张誉，（1929年4月15日后，在云浮组织农民起义中战死）梁祖誼（参加工运，在佛山被捕就义于广州），罗定中学的李芳春（在罗定组织农民起义，1928年在罗定牺牲），这些烈士的进步思想，都是在“五四运动”中开始成长起来的。

海南岛（当时名为琼崖）同样地被卷入运动的热浪中。当时，乐会县有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郭欽光，因忧愤过度而身死，噩耗传到海南，府城及海口的学生，即在府城夫子庙（琼崖中学）召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参加开会的人们，认为致郭于死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因而表示无限的愤慨，要为郭烈士复仇。同时与海南岛毗邻的西沙群岛，被北洋军阀默许日本侵占，更引起海南人民的极大愤怒。因之运动一开始便是激昂热烈的。

以琼山县海台中学为首的府海中小学校全体学生，组织了“反对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大游行”，在府城、海口的街市上结队游行，沿途高呼“打倒日本”“打倒卖国贼曹陆章”“誓不承认二十一条亡国条约”。队伍集结在镇守使署前，呐喊的声音更高更大，镇守使兼道尹黄志桓派了大批兵警，实行武力镇压，但他们派出的兵警也同情爱国群众假装打了一阵就跑开了。黄志桓面对愤怒的群众，不敢再用更残酷的镇压。

学生们除了宣传外，还实行检查日货。许多店员也帮着动手，把各洋货店——特别是当时销售大批日货的海口中兴商店所存储的日本货，搬运了两昼夜，全部搬到海口北门外海边得胜沙兄弟宫旁，点火燃烧。把灰烬推入海中，使其随着南海怒潮流去。

运动中，学生领袖是海台中学的王业禧、陈秋甫两烈士（王是会乐人，陈是琼山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人，在游击战争中牺牲），琼山中学的陈学康烈士（陈后任中共琼山县的某区

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作战牺牲）及馮白駒同志。在他们的组织号召下，各县学生，闻风响应，其中较为出色的是文昌、嘉积两县的学生。

## 結 語

从五月开始，运动在广东全省蔓延着。虽然发展的情况并不平衡。如在“南路”钦廉一带，因为当地的中等学校较少，（合浦即廉州仅有一间廉州中学，学生不过三百人），但他们仍然投身于运动中，在合浦县属北海镇的青年和市民，曾排队到日本人在北海开设的商店里，质问该商店的店主是私营的还是日本政府经营的，那狡猾蛮悍的日商，竟说“日商在北海开商店是条约给予他们的权利”，群众们在愤怒中检查了该店的来往信件，发现有可疑的词句，于是把该店的部分货物，搬到店外付之一炬。廉州镇守使隆世儒虽然企图对群众加以干涉，却不敢公然协助日商和群众为敌。

在粤北的韶关，当时也只有两间中学——韶州师范和曲江中学。由李根源率领的滇军，当时虽驻在韶关，而韶关的学生，仍挺身而出，进行了宣传和检查日货，日以继夜地在火车站检查卸下的商品，凡有日货，即予焚毁。使扼粤湘要冲的韶关，也弥漫在斗争的氛围里，从而推动了粤北山区各县的爱国运动。

运动深入而且普遍到广东各县，凡是有学校的地方，都响应了这壮烈的运动，直到当年秋天，运动才告一段落。

在运动的洪流中，新文化运动也随之发展。北京“新青年”所号召的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和提倡新文学，反对封建政治、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主张以及启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学说，亦迅速地传播着。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深入群众，和工人农民发生更好关系。其中很多进步分子，加入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和“C.P.”（共产党），从而使广东成为有名的“革命策源地”。

（附注）本文采用的史料，是由当时参加运动的郑彦范、朱勉躬（广州），彭瘦真（潮汕），杨干五（梅县），林增华（肇庆）等同志，及海南等地的老先生们所提供的。叶广良等同志借给了一些旧存文件，谨此志谢。

## 前 后 之 間

何 家 言

生活在象我們这样值得自豪的时代的人，我們总是自豪地宣称：“時間是属于我們的”、“未来是属于我們的”。这样，“一往直前”，就成为我們时代生活的特征之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任何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正在自觉地改变社会面貌和自然面貌的无产阶级战士來說，時間越是前进，就越是鮮明地展示出我們的光輝美妙的前景，我們絕不会有沒落階級那种“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的伤感，更不会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愴，为什么不“一往直前”？但是，如果象一个信心百倍的爬山运动員那样，在攀登极峰的前进中，矚望一下自己爬过的山路，俯視一下被战胜了的无数险阻，为繼續前进积蓄更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想，那也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也正是常言所說的“溫故而知新”的道理。如果把这个道理运用到我們工作中，运用到教育群众的工作中，那就是回忆对比的方法。我們的农村工作干部，对于这种工作方法，曾經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經驗。

在土地改革的严酷的階級斗争中，原来被踩在脚底下的农民，一面吐苦水，一面就咬牙切齿地仇恨地主恶霸，斗垮地主的决心和勇气就勃发起来；在宣传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綫的时候，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广泛地运用算細賬的办法，就能使那些誤入资本主义歧途的农民，坚决离开这条死胡同，那些站在十字路口的农民，坚决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整风反右的尖銳斗争中，我們又广泛地运用举办展览会的办法，把一些忘了本的农民从悬崖的边緣挽救过

来，那个在展览会上猛然醒悟，激动得痛哭流涕的刘介梅，就是这样浪子回头的……

陶鑄同志在“虎門公社調查报告”中談到对干部和社員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时，也強調采取回忆对比算賬的做法。

最近讀到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出版的“中国工人”，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夏衍同志写于二十四年前的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随后又讀了一些工人同志的“讀后感”。可以看出，“包身工”的重新发表，已經产生了編者所預期的作用：“知道解放前工人生活的痛苦，就更会感觉到今天劳动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就会更加鼓足干劲建設社会主义。”这是对工人群众进行教育的好办法。老工人从对于过去的痛苦的岁月的回忆，激发了对过去那种奴隶生活的憤慨和对剝削者、包工头以及整个旧社会更深的仇恨，引起了对共产党、毛主席和整个新社会更深的热爱；新工人不但从“包身工”所描写的那种非人的生活，看到今天工人的幸福，而且懂得“身在福中須知福”的道理。

夏衍同志“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一文的最后一段話，概括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意义：“……我想，回头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就会更深刻地感到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的幸福。人吃人的社会，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給資本家当牛馬，当公豕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們得記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們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

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这个结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不仅因为它是正确的，而且因为它不是从抽象的道理而是从历史的事实得出来的。

这里谈的，虽然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但这里面还有更多的道理，辩证法的道理，也就是怎样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时间的道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个似乎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时间问题，表述为：时间表明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和连贯性。这说明标志着时间进程的“前”与“后”这两个时间概念，也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们之间是既矛盾又统一的。

没有“前”，就不会有“后”；没有“后”，也不会有“前”。这是前后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相互依赖的方面。当未来的一旦来到了，现在就退而成为过去，“前”的出现是以“后”的让位为前提，“后”的让位是以“前”的出现为条件。这是前后之间的关系的又一个方面，即相互排斥的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前后之间的辩证关系。

## 漫谈读书

刘启扬

革命工作者，干的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作，需要具有尽可能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但一个人所能够从自己的实践中获得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而别人、前人，或者说许许多多的人总合起来的知识

既然作为客观存在的形式的“前”“后”这两个时间概念的关系是辩证的，那么，我们也就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前”与“后”的事物，即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过去和未来的事物。

俗话说说的“温故而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对群众进行教育时广泛运用的回忆对比的工作方法，都是这种辩证观点在实践中的运用；因为这里体现了时间的持续性和连贯性。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善于用这样辩证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有的人往往是用机械的观点来对待前后之间的关系，即只看到前后之间的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一面，看不到前后之间的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一面。在这样的时候就不免会干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傻事——或者是只知前，不知后，那就会老是留恋前事，缺乏对未来的远大的眼光；或者是只知后，不知前，那就会事事都时过境迁，不知饮水思源；或者是在群众工作中，只谈未来，不谈过去，把回忆对比的工作方法，当作似乎是“过时”了的东西。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都是不利于我们的事业的。

在对待前后之间，对待过去未来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是要尊重辩证法的。

1959年4月14日

则是大量的、更为丰富的。至于党中央的重要文献和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党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更是每个革命者知识来源的最重要部分。

因此，每一个人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接受人类实践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地被保留于无数的读物中。在这个意义上讲，读书，

就成为一个革命工作者的生活中所不能或缺的事情了。

当然，这里讲的读书，是为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为了使自己在革命工作中发挥更大的力量的正确的读书；不论是读现代人或古代人的书，也不论是读本国人或外国人的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当前，在对待读书的问题上，有几种思想认识和态度，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读书的积极性的。

其一是不虚心。有些同志，倒不一定就是狂妄自大、不求上进的人，然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有一种骄气使得他们不大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大愿意向别人学习；别人写出来的有益的书，在他们看来却似乎不值一顾。有些甚至对党的重要文献，也看得平平常常，对之冷冷淡淡。这在读书态度上必然表现为不认真、不虚心。端正这种态度的方法，就是加强思想修养，加强实际锻炼，而首先是要牢牢记住毛主席所教导的真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其次是懒。有些人思想上多少认识到读书的好处，口头上也讲读书的重要。可就是懒——懒于拿起书本来读，即使读了也懒得动脑筋去思考。懒，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然而从思想角度来讲，一个人有条件读书而懒于读书，总与他的朝气不足、不求上进有关系。在现实中可以看到：热情工作、朝气蓬勃的人，往往也就是勤于读书、虚心向上的人。不要把读书看作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必须把读书和工作联系起来，也就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读书，并把这当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至于读书而不动脑筋，就象吃东西不咬烂，不仅无法吸收营养，还可能引起消化不良。

还有些人借口没有时间。在某种情况下，抽不出读书的时间，这种情况是有的，

但不能说长期都忙到没有可能读点书的地步，因为实际情况也不是这样。忙，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是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在苦战的年头，不忙才怪。忙和读书在时间和精力上可能有些矛盾，却不是不能解决的矛盾。根据自己实际工作需要去读书，而不是脱离实际工作去读书，不仅不会妨碍工作，而且会帮助自己更顺利更迅速地完成任务，从而会帮助克服忙乱的现象。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这固然是主要的办法，但读书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马列主义原理也不知道，连党的方针和政策也不懂，就很难能做好工作，尽管自己辛辛苦苦整天忙乱，也不见得能把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书籍，党的政策和专门业务的书籍，都必须认真地阅读。而且读书对于一个人来说应当看成一项长远的“基本建设”，其效益是不能光从眼前来估量的。

我们工作忙是肯定的了，但还要提倡多读书，这就更应该讲究读书的方法。这就要有有的放矢、联系实际。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具体的作法是可以因人因时而异的，不必强求一致，不必拘守于某一种方法。至于读什么书和读书的时间，还要有个适当的安排，主次缓急，分别对待。重要的、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对当前工作具有迫切意义的，就先读，着重地读；其它就放慢一步去读，或者穿插着读一读。

人的知识越多越好。因为各种知识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为使各种知识在自己身上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尽可能多地读一些各方面的书，这也是必要的。如果以为和自己的业务关系不大的书，就是“与己无关”，置之不理，那未免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只要条件许可，多读一点书，总是有益无害的。

# 读右中末

## 对‘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的意见

讀了孙冰同志“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见理論与实践1958年11期）以后，有这样一种感觉：作者对在职干部的理論学习，作出了不公正的評价。如孙冰同志認為：“几年来在职干部曾經学习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学习过联共（布）党史，学习过政治經济学，学习过哲学……。在学习的时候，虽然強調了理論联系实际，但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实际上还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沒有很好地貫徹毛主席和党的号召，关键問題在于目的不够明确，还有为学习理論而去学习理論的傾向；在方法上则是从概念出发，采取了“理論——实际——理論”的公式。因而在学习理論时，首先是成套經典著作从头到尾搬过来作成提綱，一章一节地从概念上学下去；所謂联系实际，實質上是不着边际，不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問題，結果还是回到概念上去。”（着重点乃引者所加）孙冰同志还認為，其結果是“学习的人觉得枯燥无味，理論难啃，学无所用，得益不大。”

这就是孙冰同志对在职干部学习的全部估价。真的象他所說的那么糟嗎？并非如此。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們广大干部的理論学习基本上都是与党在一定时期內所制定的方針政策相密切結合着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証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針政策得到彻底貫徹和执行，从而取得胜利。如为了做好土改工作，干部学习了“土地法大綱”、“階級分析”等文件和理論問題。而在建立了人民公社的今天，我們广大干部热烈地学习了党中

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个決議。能說这是学习目的不明确嗎？能說这是“为理論而理論”嗎？我以为，在职干部理論学习的目的是极其鮮明的——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这是不能否認的。

那么，在职干部的学习是否理論不联系实际的教条主义？或者說，联系实际也是不着边际的呢？

所謂联系实际問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学用一致的問題。也就是“做什么，学什么”的問題。我們的学习作到这点沒有？基本上是作到了，但也有缺点。应当懂得，干部学习的特点是与党的政治任务相密切結合的。这点無論从“土改”“合作化”及过渡时期总路綫等学习，都得到了充分地回答。比如，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学习，使广大干部都懂得如何建設社会主义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問題，这也就調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在各个战綫上，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但孙冰却認為“在学习的时候，虽然強調了理論联系实际，但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实际上还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沒有很好地貫徹毛主席和党的号召。关键在于目的不够明确……。”不知孙冰同志是怎样理解“教条主义”的。应当說明的是，在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經济学的时候，是存在着缺点的，尤其是在学习方法上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傾向。但对这种缺点必須有正确的認識。应当把它看作是广大干部通过理論学习取得了一定收获的情况下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說，有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缺点。对

于缺点也要作出公正的評價。决不能得出“学无所用，得益不大”的結論。必須承認，几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广大干部通过学习在理論水平方面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但孙冰同志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也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始，按章照节，从概念到概念地学下去。不是从中国各个社会經濟形态的特点出发来研究学习政治经济学，结果是学习了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經濟形态，学习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不能解释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不能解释鴉片战争以后中国經濟淪为半封建半殖民經濟的問題。”我以为，如果說在学习方法上还存在着問題的話，是可以研究的；但要求在职干部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

就要解决这些問題，那是不妥当的。这种要求也有些不切合实际。因为这里混淆了科学研究与一般理論学习的一定界綫，正象普通知識不能代替专业知識一样。严格地說，在职干部的理論学习仍属于一些基本常識和原理的范围，对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是不适当的。也断不可用这点来証明在职干部的学习是理論不联系实际的。离开了实际情况要求他們暂时做不到的事情，是不够客观的。

此外，孙冰同志在“体会”中，指出某些对工农学哲学的意义抱有錯誤见解的同志，提出了批評是对的。但却认为这些同志就是“資产阶级的白旗还没有拔掉”的提法，我以为也是不恰当的。

（鞠健生）

**編輯同志：**鞠健生同志对我的“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一文所提的意见，有一些批評得很好，但有些可能出于誤解，我首先表示感謝，并作一些必要的說明。

鞠健生同志指出了我以科学研究的要求来要求一般理論学习是过高和不适当的。我认为这一点批評是对的。这种要求，拿来律己是可以的，拿来作为一般在职干部理論学习的要求确是不完全切合实际。鞠同志还指出我批評一些对工农学哲学的意义有不正确看法的人用了“資产阶级的白旗还没有拔掉”的提法不恰当。我也衷心接受这个意见。

除了上述这些正确的批評之外，鞠同志还引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話，并认为这是我对“全国范围”的在职干部理論学习所作的“全部估价”，这可能出于誤解。首先，我說“在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实际上还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縛，沒有很好地贯彻毛主席和党的号召”，由于在学习态度和方法上有缺点，所以“还有为学习理論而去学习理論的傾向，在方法上则是从概念出发”，因此，才“觉得枯燥无味，理論难啃，学无所用，得益不大。”这只是就一部分在职干部来說的。我不是在文章中标明“还有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这些字样嗎？可见我并没有把全国在职干部都包括在內。其次，和鞠同志的批評恰好相反，我是肯定了广大干部的理論学习已取得很大成績的。因为我在前面，对基本的一方面，已經說过：“在我們党内，在广大的干部中，在广大知識分子阶层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可见，如果要說我是对在职干部学习成績的“全部估价”的話，那我还是首先肯定了成績的。最后还应指出，我所說的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并不是指党的領導理論学习“目的不明确”。我以为領導上的明确是一回事，某些干部本身对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又是一回事。至于鞠健生同志提到关于党布置学习“土地法大綱”、“階級分析”以及在我那篇短文写了之后才发表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等文件的学习問題，那就更是我这短文以外的問題了。

以上所述，就算是我对“重讀‘改造我們的学习’的一点体会”一文的一点补正和說明。

（孙冰）



## 华南师院討論中国封建社会分期問題

华南师范学院史政系中国史教研組于四月份內举行了两次討論会，討論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等問題。

主张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期的有唐陶华教授、徐光仁教授、陈千鈞教授、张寿祺老师和胡石林老师等。但在具体划分阶段时，他們的意見又各有不同。

唐陶华教授首先介紹了欧洲封建社会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的具体特点，然后結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认为应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即封建社会的早期（从战国到三国以前）；封建社会的中期（从三国以后到明初）；封建社会的晚期（从明初到鴉片战争以前）。

徐光仁教授认为：中国早期封建社会始自西周，而迄于秦統一。此期的阶级关系是由貴族領主統治到家族地主統治，由农奴到农奴化的农民；中期封建社会历时最长，可分前后两段，前段从秦到隋統一，后段从隋到元末。前段的阶级关系是士族地主对豪强的依附和奴隶化的农民；后段主要是地主阶级对佃农的剝削，农民淪为奴隶现象已不普遍。唐以后民間手工业商业有更大发展。后期封建社会从明到鴉片战争前。阶级关系大体如前，但封建社会内部已显著孕育出資本主义的芽苞，手工业、商业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原始資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先驅，虽然他們还没有形成阶级，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却在变化中。

张寿祺老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三个时期，但他的分法是：（1）前期：从春秋到南北朝，其中又可分两段，第一段是春秋到秦統一，第二段是秦统一到南北朝。第一段的生工具已經使用鉄（从文献上和考古上都可以証明），地方經濟較为普遍的上升（从文献上也可以看到），这是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意識上出现了墨家思想；說明劳动人民所处的历史地位与西周时大大不同，可见，春秋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第二段已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奴隶制残余仍存在；鉄的使用比較春秋战国时更普遍；在生产关系上，有权势的大官僚貴族强占农民的土地；农民战争的鋒芒主要是指向皇室，还没有明显地朝向整个地主阶级。（2）中期：从隋统一到明初。生产力比前发展了一步，唐代手工业上出现“巧儿”，商业上出现了“飞錢”，货币流通，各地經濟联系較紧密，商品生产比前更进了一步。在阶级斗争上，农民起义的斗争口号比以前明确，斗争鋒芒朝向整个地主阶级。（3）后期：明中叶以后到鴉片战争前，明中叶以后出现了資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

此外，主张四分法的有关履权老师等。教师们都認真钻研有关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并准备繼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找出其中历史发展的基本綫索和特点，以充实自己的論点，希望通过更深入的討論，取得統一認識，以便編写該院新的中国封建史教学大綱和讲义。

（鍾珍維）

## 东南亚經濟資料汇编(季刊)

- (1) 本刊于每年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及十月一日出版。
- (2) 本刊主要刊载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东南亚各国經濟問題研究的資料和专著, 主要内容包括: ①东南亚各国經濟状况及发展动态的报道; ②东南亚各国华侨状况的介紹; ③东南亚各国經濟研究专論; ④东南亚各国經濟統計資料。
- (3) 本刊系内部发行刊物。机关团体或个人, 均凭有关單位介紹信訂購。訂閱处: 全国各地邮局。零售处: 广州市永汉北路126号邮局期刊門市部。
- (4) 每期定价0.50元。

附志: 本刊第一期、第二期已經出版。倘訂購不便, 可来信委托本刊編輯室代办。

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經濟研究室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59年第5期(总第17期)

編輯者: 理论与实践編委会  
广州越秀北路中国科学院  
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出版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大南路43号

1959年5月20日出版

印刷者: 广东人民印刷厂  
发行者: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預訂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